

·名人手札·

章太炎上曲园老人手札考释

俞国林 朱兆虎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新见章太炎上曲园老人俞樾手札的整理与考释,一方面考察此批信札的保存、流传情况;另一方面梳理章太炎早年生平、求学、交游、著作等情况,厘清章太炎与俞樾暨诂经精舍、康有为与俞樾的关系,解决《春秋左传读》成书及初印时间、《膏兰室札记》撰写时间以及章太炎接触西学的时间等问题,为研究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提供新的线索。

关键词: 章太炎 俞樾 宋云彬 书信 诂经精舍 《春秋左传读》

一、引言

俞曲园是章太炎在学术研究上最重要的老师,太炎的“谢本师”更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宗公案,但有关太炎早年求学诂经精舍前后,与曲园直接往还的文献资料,所觐寥寥。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二十三岁:“正月,先君歿。既卒哭,肄业诂经精舍。时德清俞荫甫先生主教,因得从学。”二十二年丙申二十九岁:“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①岁暮(时已在1897年1月),应梁任公、夏穗卿之邀,离诂经精舍,赴上海任职《时务报》馆。又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②

太炎就学诂经精舍期间,曾与曲园老人有书札往还。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为张继(溥泉)藏曲园致徐琪(花农)书札、诗稿十册题识云:“余昔所

①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丛书三编》本,第3页、第4页。

②转引自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79页。

藏先师手札亦十馀通,转徙失之。”又云:“余二十六七时,尝求师示古人嘉言以自勉,师为书《文心雕龙·诸子篇》语,末附题识,嘉其不求闻达,专心著述,而勖以立德、立言,遭变故,此轴亦不存。”^①则是太炎所藏曲园手泽早已遗失。

而太炎上曲园手札九通并孙诒让、戴望致曲园函札,共计十六通,民国十三年为俞平伯发现于苏州旧宅,装裱成册,称《三经师手札》,护惜有加。可惜经过近百年风雨鸡鸣,白云苍狗,且又迭遭离乱,多少故物,而今不知流落何处。

天佑斯文,幸有宋云彬曾于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借得俞平伯所藏册页,将太炎手札摹录一过(称之为《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随着2015年宋云彬文孙宋京其捐拍宋云彬旧藏书画,这件珍贵的手札册页始公之于世,并收录进《宋云彬旧藏书画图录》一书出版(中华书局,2015年),使我们得以考见俞、章二先生师生交谊细节,以及太炎早年事迹、思想轨迹。

二、《三经师手札》之流传

《摹章太炎上曲园手札册页》首为太炎民国二十一年题识,次手札九通,次吴承仕民国十八年跋,次俞平伯民国十三年跋,次俞平伯节抄民国十八年太炎复吴承仕手札,末为1951年王伯祥为宋云彬摹本所作跋语。通过以上题跋,并结合其他文献之比对,我们基本可以梳理《三经师手札》之流传以及宋云彬摹录之相关情况。

1. 诸家之题跋

俞平伯跋曰:

三君并近世经师,学人宗仰。戴、孙早归道山,章君则及见之。今春在吴下旧居,检得昔年寄与先曾祖之书札,凡三家一十六通。就中仲容先生之三月望笺、太炎先生之附姓名居址笺,似俱为初通音问之品,弥觉可珍矣。十三年除日,平伯谨跋于京师。

吴承仕跋曰:

章君撰《左传读》三十万言,其说“季兰”为“变”,在第一卷中;说“轨度”为“究”,在第五卷中。是书属稿早就,醵资刊布,盖在胜清光绪丙申之岁,时曲园先生七十五,章君则二十有八也(时承仕年十三)。章君自言,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作《客帝篇》,迄辛丑而《馗书》始成,明攘夷之志,盖确立乎庚辛之际也。又案曲园先生尝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几为俗说所染(章君今年来书,犹道及此事),而章君则斥之不遗余力(谓斥皮锡瑞也),亦由改制之说为尊清者所假借,足以堕光复之业,故深恶而痛绝之。纠合义旅、犁庭扫闾之言(此二言见册中第九通书),一何壮也。今遂屏居海隅,见侮于后生小子。大勋不报,谅哉!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吴

^①《俞曲园手札》第一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手稿本,书号21946。

承仕。

俞平伯节录章太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吴承仕函曰：

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盖长素于甲午前已谒曲园，出其《新学伪经考》相示。当时鄙人尚未见其书，甲午后乃得见之也。鄙人三十以前，说经或多细碎，至于今古文之辨，则胸中颇有准绳，至今未变。孙仲容亦为古文之学者，戴子高则原出宋于庭，实今文学中人，然亦精研训故，非如后来者之夸诬也。

章太炎题记曰：

俞子平伯，先师曲园先生之曾孙也。以余昔时上先师书并戴子高、孙仲容二君手札，都装一册，称以“三经师”。戴、孙，乡邑先进，望实卓然，余何敢比肩。独念自侍先师以来，今四十馀岁，虽数遭颠沛，未尝废经。间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耳。余治经尊古文，与仲容合，而与子高绝相远。令二君至今尚在，辩论相发，庶几贾景伯、李元春之事。惜乎，不得其会也。民国二十一年季春，章炳麟识。

通过上述诸文时间，我们可以知道，民国十三年俞平伯在苏州旧居发现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人致曲园信札，称《三经师手札》，并于除夕日（1925年1月23日）跋之。民国十八年，又请太炎弟子吴承仕题跋，吴跋据信札所涉内容与太炎所撰《左传读》对照，似欲说明其通信时间。其间必有上太炎书以询问此事者，故太炎答书，有“鄙人与曲园先生书，约在甲午以后，丁酉以前”诸语。俞平伯见之，即将该信相关内容节录于后。

太炎之题记，自谓“以所得，传之其人，转相付授，犹颇有兴起者，斯道不绝，为无负先师之提命”，可见在学术上，太炎对曲园之敬重，则章门之弟子，即曲园之再传也。

2. 章太炎题记时间

《三经师手札》一直由俞平伯保存，此前曾有钱玄同提及，其民国十四年5月30日日记曰：“俞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三君致曲园信一册。”^①周作人1931年1月20日致俞平伯札云：“昨日上午匆匆去上课，戴君手札尚在兼士手中，及下课来不见他，想必已将该札交还足下了吧。”^②可知俞平伯又出示于周作人，1月19日周作人传阅给沈兼士，后当交还俞平伯。

章太炎题记作于“民国二十一年季春”，按民国二十一年2月29日（农历正月二十四）太炎因“一·二八”事变仓促避难北平，顺便讲学，章门弟子纷纷宴请。时俞平伯任教清华大学，钱玄同乘便安排他拜见章太炎，钱玄同4月7日日记称：“五时，雇汽车请幼渔代接老夫子到东兴楼，因今日我赏饭也，因拉

^①《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0页。

^②孙玉蓉编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64-166页。

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也。宾主共六人，章、俞、马、马、朱、钱也。”^①其中二马指马裕藻与马衡，朱指朱希祖，从“拉拢太炎、平伯二人一见面”可知，此次盖为章太炎与俞平伯之首次见面。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两人见诸记载的交往还有两次。一次是4月18日（农历三月十三）马裕藻宴请章太炎、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半农、魏建功、胡适、蒋梦麟作陪（分别见钱玄同与周作人日记）。另一次是5月15日（农历四月初十），周作人设家宴款待章太炎。周作人是日日记：“下午天行来，共磨墨，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晚饭，玄同、遏先、兼士、平伯亦来，共八人。用日本料理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饌。十时半仍以车与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②钱玄同是日日记：“我下午四时至周宅，今日启明赏饭于其家，日本与绍兴合璧，日本菜极佳。同座为朱、马、沈三、俞、魏也。大家均请老夫子写字，他称平伯为‘世大兄’。”^③从时间上来说，俞平伯是在与太炎会面之后持《三经师手札》请作题记，落款曰“季春”，则完成于5月6日（阴历四月初一）之前。在周作人的家宴上，太炎还应众人之请，各写字一件，其为俞平伯写《论语》条幅（今存德清县博物馆），称之为“世大兄”，礼敬而又亲切。

3. 柳亚子题诗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与宋云彬等一行抵北平（2月28日自香港出发）。28日俞平伯即致信柳亚子，有“日前重接光仪”句^④，则前此数日二人当已见过一面。

柳亚子4月6日日记曰：“赴华北文艺界协会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谈话会，五时聚餐，与陈学昭女士第一次见面，并坐同席者圣陶、平伯、云彬、卞之琳、臧克家，共七人。”^⑤仅从称呼而言，柳亚子与俞平伯应该是熟悉的。15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奉手教，敬悉明日社团盛会，荷宠邀，自当移侍，并以得拜识南社诸君子为幸也。”^⑥从之后俞平伯呈柳亚子诗“东城偶集簪裾秀，南社曾瞻齿德尊”二句来看^⑦，俞平伯当是参加了此次诗社盛会的。24日，许宝驹、许宝騄兄弟宴请宾客，俞平伯与柳亚子、朱蕴山、谭平山等三十余人参加，柳亚子有诗纪之^⑧。

据柳亚子自述（参见下文引题三经师手札诗其二自注），其十七岁时读书

①《钱玄同日记》，第854页。

②《周作人日记》（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40页。

③《钱玄同日记》，第860页。

④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75页。

⑤《北行日记》，《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

⑥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78页。

⑦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79页。

⑧《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66页。

上海爱国学社,曾入章太炎之门,与邹容相稔,并与友好集资刊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得到章、邹器重。宋云彬在《章太炎二三事》里说到章太炎曾送给柳亚子扇面,所录是太炎自己的诗:“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①此诗为太炎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题《名学会摄影书后》,曾刊登在是年《选报》第十二期上。次年,太炎有致陶亚魂、柳亚子书,历数自己思想之转变,后亦将前诗书扇赠柳亚子^②。如此,柳亚子则为太炎之弟子,而曲园之再传弟子也。

5月2日,柳亚子寄《叠韵和平伯先生兼呈长环夫人》诗给俞平伯,有询问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三传事。诗下自注曰:“曲园翁一传而为太炎章先生,再传而为检斋吴先生,皆以学术家而兼思想家,且并致力革命,非琐琐经生,岂刘申叔、黄季刚辈所能望其项背?此友人齐燕铭同志告余,燕铭则检斋门下士也。宋云彬兄谓太炎《谢本师》一文,实为爱护曲园翁,虑其株连受祸而作,非真有所不满于师门。此言亦良是。”^③按,关于章太炎《谢本师》事,宋云彬先后有两篇文章分析过,其在《章太炎的〈谢本师〉》中写道:“章太炎受业于德清俞曲园。太炎加入革命党,反对清廷,曾受俞氏呵斥,他撰《谢本师》一文,起而抗辩。我想他写《谢本师》这篇文章,还有别的原因。当时清廷的专制淫威,可以使人遭灭门之祸,他既加入革命党,公开声讨清廷,深恐因此而连累到他的本师,特地写这篇文章,替他的本师预作开脱地步,当时他们师徒之间,一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④

5月12日,俞平伯致柳亚子函曰:“先曾祖与太炎先生之离合始末,诚有如来诗跋语所云。盖太炎晚年犹惓惓师门,于行文时仍称先师云。自吾曾祖三传而至检斋先生,于政治意识之前进上真有积薪居上之感,盖亦时命使之然耳。”16日又致函曰:“鲁、吴二君,诚余杭门下龙象,如惠赐诗篇所云。黄季刚师晚节虽蹉跎,终胜申叔甚多。至前书之‘三传’,确是‘再传’之讹。承指误,并感。”^⑤鲁、吴二君指鲁迅、吴承仕。

基于俞平伯与柳亚子关于俞曲园、章太炎、吴承仕等探讨之深入,且柳亚子亦为太炎弟子,俞平伯遂有请柳亚子为其所藏《三经师手札》题跋之议。5月22日,柳亚子设宴颐和园万寿宫,为自己六十三岁生日“暖寿”,俞平伯、宋云彬等受邀参加。俞平伯即持《三经师手札》往之,路上,示诸同行众人。宋云彬

①《章太炎二三事》,《宋云彬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181页。

②1906年,此信刊于柳氏主编的《复报》上,题《致□□二子书》,署名西狩,西狩为太炎笔名。1940年《制言》六十一期刊登柳氏录《太炎先生遗札》,收入信与诗,诗名《失题》。

③《磨剑室诗词集》,第1583页。

④原载《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一期,1942年9月15日;后收入《杂抄三则》,《宋云彬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120页。

⑤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80页、第81页。

当日日记称：“途中平伯出示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致其先曾祖曲园先生函如干通，裱成册页，颇堪重视也。”^①次日，柳亚子即赋诗五首。其是日日记曰：“晨起为平伯题浙江三经师致曲园翁手札册页，成诗五首之多，颇得意。”^②此五首诗收入《磨剑室诗词集》题作《平伯先生长环夫人出所藏余杭师暨戴子高孙仲容两先生上曲园翁笺札册页见示属为题诗敬赋》^③，分咏俞曲园、章太炎、戴子高、孙仲容、俞平伯五人。诗曰：

吴门流寓曲园翁，身世随园有异同。籍著两家称弟子，先妣费太君讳漱芳，晚号德园老人，髫年时受业于同邑襁湖徐九如女士，而女士母吴琼仙，则随园《湖楼请业图》中人也，故先妣于随园，可称三传弟子。余少游余杭师之门，又实为曲园翁再传弟子云。缘慳一昔坐春风。颇闻谬论神狐祟，倘与微言伯定通。世传曲园翁典试某闾，为妖狐所祟，出题“君夫人阳货欲”，以是免职，余颇疑翁见清政不纲，不欲侧足焦原，故以微罪作归计耳。此与龚自珍答友人问“正大光明殿赋”官韵，谓是“长林丰草，禽兽居之”者，殆有相同之点云。更喜曾孙传慧业，刘樊仙侶酒边逢。

余杭门下负传薪，敢与周吴竞德邻。谓周树人、吴检斋两先生也。贱子髫年惭受薪，本师晚节定完人。邹容墓草华泾宿，马叟书楼歇浦新。电稿沉沦征未得，不应天遣丧斯文。余年十七，读书上海爱国学社，始及余杭师之门，与巴县先烈邹蔚丹讳容者相稔。余杭著《驳康有为政见书》，巴县著《革命军》，余偕同邑蔡治民姑丈、陶亚魂挚友，醵金付大同书局印行，二公以是重余。《苏报》案起，老贼吴敬恒告密，两公牵连入狱，犹以书勉励余，余杭书有“庶使朱长孺、陈长发辈知后起有人，积薪居上”云云，朱、陈并吾邑之明遗民也。余杭判苦役三年，巴县两年，而巴县竟瘐死提篮桥西牢中。有言清虏实贿狱吏，以鸩毒毙之者，疑莫能详已！余杭狱期满，孙先生在日本东京，遭同志龚炼百诣上海近之，遂主《民报》社。辛亥革命以还，踪迹疏阔，芦沟桥抗战前后，闻与丹徒马相伯先生通电宣言，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余为拍案叫绝。惜求此电文十年，尚未入手，为遗憾耳！巴县殉后，亡友刘三为营葬华泾，今刘三亦久逝矣！

梦隐吾留第二图，戴君遗迹未模糊。此才合继杨秋室，家祭宁忘陆鉴湖。樵史南明应不朽，校书白下似追逋。思量温李徐钱传，册载终怜旧业芜。子高有《梦隐图》。四十年前，顺德蔡寒琼为余续《梦隐第二图》，余自题《金缕曲》一阕，颇沉痛，盖有天荒地老之感，不虞今日之翻身也！南明遗事，用正史体裁写订者，首为乌程温晒园之《南疆逸史》，而吴郡李瑶、六合徐鼐继之。李书名《南疆绎史》，盖得晒园残本，而窜改增补，实为点金成铁之作；徐书名《小腆纪传》，其命名颇恶劣，而书则后来居上也。其后元和钱绮、大兴傅以礼两人，一撰《南明书》，一撰《后明书》，似均未脱稿云。归安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若干首，存《秋室集》中。盖终胡清之世，温氏书只有传钞，绝无刻本。子高客南京官书局时，始得一钞本，加以校勘，丹黄狼藉，藏上海涵芬楼中，安阳谢刚主〔国桢〕撰《晚明史籍考》时，犹及见之，惜毁于倭寇“一·二八”淞沪之役矣！幸子高别录一副本，附以杨跋，寄赠傅节子〔以礼〕，后归吾友顺德邓

①《宋云彬日记》，《宋云彬文集》第四卷，第145页。

②《柳亚子自述续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③《磨剑室诗词集》，第1620页。

秋枚〔实〕，始由国光书局铅印行世云。余少喜史学，颇以撰述《南明史》自任，蹉跎卅载，一事无成，弥深遗憾。曩在桂林，与挚友朱琴可〔荫龙〕，有修史之约，极盼琴可能早日北来，共襄盛业也！

大吕黄钟孙仲容，天图地碣辟鸿蒙。郑玄经术非吾恋，剧孟雄心喜汝同。未见柳车藏季布，早令海曲窜梁鸿。华夷大义春秋笔，丽稔留传在浙东。传余杭出狱时，仲容曾与通问，署名荀美，拟招余杭居温州，以北海孙宾石自命，会余杭已东渡，乃不果云。

生惭赐也善方人，羞说薰蕕共一尘。胡广中庸能劝晋，延陵抗节抵成仁。目无馀子狂奴老，学有渊源家法新。感激温柔敦厚意，不辞着粪佛头频。昔贤言：“与公瑾对，如饮醇醪。”余见平伯先生，亦有此感，恒以温柔敦厚四字品目之，盖人如其诗，诗如其人矣！于长环夫人亦云。

5月28日，柳亚子生日，在萃华楼设宴庆贺。宋云彬是日日记：“傍晚赴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亚老今日生辰，至友七八人在萃华楼设宴庆贺，余亦参加。”次日，柳亚子复在中山公园设宴，答谢昨日前来祝贺之友朋。宋云彬是日日记曰：“中午，亚老在中山公园上林春设宴答谢，偕同伯宁、剑行往……平伯所藏太炎手札已自亚老处取来，今日开始以打字纸复写，俾供参考也。”^①宋云彬治学论文，雅近太炎，且喜谈经，有“太炎迷”之称。所以当他看到太炎早年上曲园手札后，其心情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心生摹录之意。

4. 宋云彬摹录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著名的文史学家、编辑家，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生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后均遭通缉。潜隐上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工作。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1年底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任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被错划作右派，次年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与编辑工作，被誉为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1979年2月右派得到改正，同年4月逝世。

宋云彬对章太炎颇为崇拜，其在桂林时曾写过一篇《读〈馥书〉》：“我是喜欢翻翻旧书的，尤其喜欢读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言之有物，而文笔简练，起讫自在，不象一般写古文的，搭起了空架子，起承转合，而内容却空空如也。但在桂林，想买或者借一部《章氏丛书》是没有的；最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馥书》，慰情聊胜于无，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②比较难读的《馥书》，“一周间竟读上了十多遍”，可见“太炎迷”不是挂在口头上的。

①《宋云彬日记》，《宋云彬文集》第四卷，第146页、第147页。

②《宋云彬文集》第二卷，第345页。

宋云彬向柳亚子提出借阅此册页,估计是1949年5月28日在“韶九胡同陈振汉处访亚老”时,得允(宋云彬之所以未直接向俞平伯借阅,一则可能两人不甚熟稔,再者俞平伯对此极为珍视)。遂于29日“自亚老处取来”,始得“以打字纸复写”也。据宋云彬日记,5月30日“复写太炎手札两通”,6月5日“早起,复写太炎手札数通”,6日“钞太炎手札三通”,7日“钞太炎手札数通”,10日“摹写太炎手札毕”^①。

俞平伯5月22日将《三经师手札》交给柳亚子,请题诗。十一天后即去信催问^②。此时该册页犹在宋云彬摹录之中。直至6月21日,该册页才通过叶圣陶还给俞平伯^③。俞平伯读了柳亚子题诗后,致函谢,函中称“于跋语结尾,并谂前日欣逢丈揽揆之辰”^④,知柳亚子落款处,必有提及生日云者。而此《三经师手札》之原件,之后便如空中黄鹤,杳无音讯矣。

宋云彬摹本仅摹录章太炎手札九通及其题识,并誊录吴承仕、俞平伯跋语等,于7月14日托汪君将之送琉璃厂裱画店裱成册页。

1950年5月5日,宋云彬好友王伯祥到北京出差。7日即来过访,宋氏出此册页示之。王伯祥“挟归寓所”,后有跋曰:

云彬治学论文,雅近余杭章先生,而喜谈经方,亦时复玄契。二十年前,余与君接砚齐辉堂,共事丹铅,辄以“太炎迷”目之,相引为笑,不违也。丁丑倭难作,君远走湘桂黔蜀之郊,所至宣力文教,阴为人民地,颇中当事之忌,违难香港者有年。迨北平解放,君又从海道间关入都,协赞新治乃退。然仍理故业,在出版总署任编审。余滞迹沪滨,与君睽离十馀载,不获一面,每涉昔游,时形梦寐而已。庚寅春杪,余以事北来,亟过访其京邸,欢然道故,见君春容雅度,不减当年,而鬓毛异色矣。谈次,出斯册视余,君初入都时假诸平伯,手摹自存者。余挟归寓所,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未几,余以屏当移家,匆匆南旋,斯册留扁行笥,未及检还。秋深重来,复以尘事劳扰,遂尔寝阁。今理笥得之,顿触曩绪,不胜愧汗,爰志颠末归之。一弹指顷,岁逾一周矣,君不笑其疏慵犹昔乎?辛卯夏至后一日,巽斋王伯祥谨识。

所谓“展玩数四,恍亲真迹。盖其笔画起落,婉转神似,无毫发憾,足征瓣香有素,心慕手追,乃克臻此,非徒耽情翰墨,结习难蠲已也”,足见宋氏临摹时之敬畏,一丝不苟,无愧太炎粉丝之雅号。

①《宋云彬文集》第四卷,第147-150页。

②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81页。

③至于宋云彬何时交还柳亚子,柳亚子何时送叶圣陶,或者宋云彬直接交给叶圣陶,皆因相关资料残缺或日记失载,无从考得。

④李军:《俞平伯致柳亚子书札十通考释》,《文献》2014年第5期,第82页。

由于太炎此九通书札、一篇题记暨俞平伯节录致吴承仕之函,并吴、俞跋语,皆未见刊载,亦未见他书征引,益不知经历各种运动后其原件是否尚存天壤。若原件无考,则此册页之价值,直可以“下真迹一等”视之。

三、九通手札考释

手札九通之序,乃俞平伯据其所判定之时间先后为次。今粗为考订,最早者为第一通,于光绪十九年庚寅(1893)呈递,可能是太炎上曲园的第一通信札,最晚者为第八通,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仲秋以后,除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外,逐年有书,可见保存较为完整。

曲园对太炎学术上之影响自不待言,九通中涉及有所陈请者便有四通,求序者,请举荐者,正当或跃在渊之年,其仰赖曲园之力亦厚矣。而奔窜以后,追念曲园清风,已然成为师门张大旗帜者,可以见出此跨时七年之丹心吐诚中,太炎之成长历程。或论学,或慰问,或预作寿序,或论议时局,或月旦东国学人,或纠合同道多士,内容多方,所关系者甚大。又兼上书本师,敬同课艺,文辞典雅,书法朴茂,洵尺牍文翰中之绝品也。

九通手札全用隶古定书写,与后来手札、手稿多用行草大相径庭。一者究心小学,于平日书札,也时刻留心文字之点画所自;再者上书业师,自当虔诚恭敬,一笔不苟;另与曲园之身教或也大有关系。曲园《春在堂随笔》卷一开首即说:“余自幼不习小楷书。”^①又云:“江艮庭先生生平不作楷书,虽草草涉笔,非篆即隶也。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风,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②至晚年慨叹云:“求书者多,日不暇给,率以行草书应之,不轻作篆隶书矣,殆亦衰征也。”^③太炎民国十六年跋曲园手札,尚致意此事,云:“先师曲园翁平生喜作汉隶,馆人笥师求字,亦为下笔。”^④太炎所书虽非汉隶用笔,但横竖转折,皆有篆意,稚拙古雅处,与曲园隶书手札颇多神似,不乖师法。宣统元年(1909)与钱玄同商讨印行其小学著作之用字,亦主用隶古定法:“正名当自身始,说良黠。然直用小篆移书,其间或近正俗字,猝不得其本形者,便当杂以左书,错出无纪,唯以今隶勒存正体,如‘隶古定’法,斯可矣。”^⑤太炎此一时期所书,另如《春秋左传读》石印本(光绪十九年癸巳)、《独居记》(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上谭献书》(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七略别录佚文征序》(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月)等,与其后来手迹相较,大体可以看出太炎书法变化之迹。故以下所录书札本文皆

①《春在堂全书》第5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97页。

②《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397页。

③《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175页。

④《俞曲园手札》第一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手稿本,书号21946。

⑤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用繁体字，以略存太炎用字习惯。

第一通

夫子大人函丈：

自逮門下，星厯三迤，猥以蟠木恆材，得冢雕飾。而僻居下邑，擁蔽樸愚，未得一侍董帷，親奉几杖，豈直悵惘，負咎寔深。自幼好《左氏舊說》，時弄雕蟲，忘其盲瞽，輒因諸家鵠詁，益求新葦。嘗以“季蘭”爲“季變”，“軌度”爲“究度”，及讀吾師《平議》，語皆合如璽節，拚掌自惠，知不爲臆說矣。日積月聚，得《左傳讀》八百餘條，又駁劉申受書，以明《左氏》羣委，全稟繁重，郵寄爲難，是以未及呈覽。時因月旦，拊箸幅末，用求礪削，使就準繩。不悟子慎數語，見契鄭公，慙喜交至，筆舌難罄。惟河東之豕，生子白頭，滯迹一隅，自矜奇賜，非付之木聖，無以廣問通人，使得揜撫利病。而蠶蟻沈響，名實未加，醖金付梓，聞者眴應。惟吾師智周鑒遠，物無遺照，顧盼增其倍賈，翦拂使其長鳴，幽介蓬心，實所跂望。自忘冒瀆，輒呈募啓一編，如恕其狂瞽，略識數言，不吝齒牙，爲生毛羽，則叔孫弟子，庶得以先生自重，附驥致遠，何幸如之。至于著書本旨，已具啓中，不復贅述。

受業章炳麟長跽上

章炳麟字梅叔，餘杭人，（精舍課卷一名洪昌烈，一名章炳業。）寓杭城小塔兒巷朱潔泉宅。

按，第四通云“三月間以《左傳讀》呈覽”，殆指此札請序之事，倩人作序，書札、募啓當同著作一起呈遞。第四通作於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則此札作於是年三月。

札云“全稿累重，郵寄爲艱”，故當值曲園三月間在杭州時面呈也。曲園《俞樓雜纂》第五十《俞樓經始》云：“余每春秋佳日，必自吳下寓廬至西湖精舍，多或一二月，少或一二句，歲以爲常。”^①《瑯英小錄序》稱癸巳仲春二十有八日得劉樹堂（景韓）所贈瑯花，其後適行謁經精舍三月望課，即以《杭州瑯花歌》命諸生作之^②，是知曲園本年三月確曾莅杭^③。

抑或此札作於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秋後，俟十九年春曲園莅杭後方與著作一同上呈，則與“自逮門下，星厯三移”稍合（第四通云“受經門下，先後四稔”），兩皆可能。札云“僻居下邑，未得一侍董帷，親奉几杖”，似初自餘杭寓居杭州。太炎光緒十六年庚寅二十三歲入謁經精舍，十八年二十五歲，上引太炎《口授少年事迹》云“二十五歲始居杭州”，與此札時間相合。

月旦，精舍每月有望課，由掌教曲園命題、閱卷，按卷甄別優劣，評定等級，

①《春在堂全書》第3冊，第772頁。

②《春在堂全書》第7冊，第671頁。

③因曲園時有不至者，光緒十四年《茶香室經說序》云：“去年夏，有腿生瘍，精力益衰，故秋間不至西湖，于吳下寓廬，閉門養疾。”（《春在堂全書》第7冊，第1頁）

分内课、外课、附课三等,依等级派给膏火,按名次另赏奖金,附课无膏火无奖赏。《诂经精舍志初稿·程试》云:“课试高第,例有奖助。自同治以降,大较内课二十五名,外课二十名以内,有随卷给奖之例,奖额丰杀,视名次隆杀为等差。附课无奖。”^①

精舍课卷,并有点评之语,如光绪某年五六月并课,内课第十九名汤聘伊卷,曲园批云:“体伸之说未安,毫毫皆非形声,说亦曲,未足以订正许书。”^②汤氏课艺仅《诂经精舍课艺八集》收有数篇,当与太炎同时肄业。太炎有《八十曰毫九十曰毫解》收入《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又有《毫有七十八十解》收入《八集》,题下另有杨誉龙一篇,必皆名列前茅之卷。观曲园批语,可以想见当时情景。又某年四月望课,外课第二名洪如松卷批语:“秃笔写字,另有一种老气,奖洋十五元。”^③《诂经精舍课艺》前六集刻本皆有圈点,即课卷评点之遗。

谭献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记云:“同白叔过龚甫,见案头有余杭章生说经文稿,谊不尽确,要为得间。汇记于此。”^④汇记四条,皆见《春秋左传读》(卷四、卷六、卷八)。高保康字龚甫,仁和人,高宰平(学治)次子,太炎初印《文始》亦由高氏题签。曲园光绪十九年癸巳前后致高保康书:“龚甫仁兄世大人赐览:二十日想必行望课,如课卷能于廿五日收齐付下,使弟于山中批阅,较为清静,弟拟廿八日出山也。手此,布颂文安。世弟俞樾顿首,十九日。”^⑤清代书院设置较简,太平天国之后,诂经精舍仅聘掌教一人,监院二至四员不定,负责分收课卷、给发奖赏等事宜^⑥。可知高保康时任诂经精舍监院,谭献案头所见,当即太炎“时因月旦,附著幅末”者。

精舍课卷仅署姓名,不糊名,亦不著籍贯,故太炎上书,并著表字、籍贯以为“名刺”。洪昌烈名见《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卷十二,收录其《满城风雨近重阳》辘轳体集句诗五首;章炳业名见《诂经精舍课艺八集》,收录其课艺八篇,皆同时肄业精舍者。太炎于“余杭人”后介绍二人,盖同为余杭籍。章炳业为太炎仲兄,自是余杭人。《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五月十五日纪浙江学政按临杭郡,洪昌烈名在府学之列,据此札,似亦余杭人。

章炳业,后改名箴,字仲铭,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举人,与张宗祥、许宝衡同科,民国二年(1913)任浙江图书馆监理兼编辑,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任馆长。《浙江图书馆志》皆失其卒年。按章仲铭尝为太炎《说文部首均语》作注,后徐复撰成《补注》,孙世扬民国二十五年序云“仲铭之歿,于今

①《诂经精舍志初稿》,《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第1-47页。下引该志均出此,不再出注。

②《诂经精舍志初稿》插图,《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卷首。

③《诂经精舍志初稿》,《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④《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4页。

⑤西泠印社2015年春季拍卖会第2102号拍品。

⑥《诂经精舍志初稿》。《学海堂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三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七年”^①，则是卒于民国十九年。太炎民国二十年致黄侃书，有两通具名上有“期”字，当为仲兄服期服时，其中一通作于七月十四日，可证。孙氏序又云：“世扬尝为仲铭先生诊候，从容谈说，必及许书，知为深于小学者。”殆孙氏亦不知章仲铭肄业精舍也。

太炎父章濬，曾任诂经精舍监院^②。据乡试硃卷，太炎长兄章椿伯（字椿伯，后改名錢）亦肄业精舍，又任浙江书局校讎，校有《经义考》《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等；太炎妹婿张荫椿亦肄业精舍^③。足见渊源之深。

寓朱洁泉宅，疑“洁泉”为表字而非别号，查《申报》，光绪十年至十二年，杭州朱洁泉有三次赈捐，一次与太炎长兄章椿伯（炳森）并列清单，一次与后来诂经精舍监院许子颂（滢祥）并列。清单列名数十，多似表字。或曰朱洁泉为太炎外叔祖^④，未知所据^⑤。查海盐朱丙寿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会试硃卷，太炎外祖父朱有虔兄弟中，与“洁泉”相应之名绝少（有“朱有源”一名，道光八年戊子举人，此时或已下世）。太炎为长姊所制谏文^⑥，称寄居长姊之家，得以在杭求学，长姊病歿，无所寄托。而此札称寓朱洁泉宅，距长姊病歿仅三五月，谏文云长姊适朱际清，“际清”、“洁泉”名字相应，窃疑朱洁泉即太炎姊夫朱际清也，故赈捐清单中与章炳森并列。

第二通

夫子大人函丈：

莫萼執塵右台，獲聞提命。自爾數迫冗事，卒卒無須臾之間得奉書疏，時從蘇員旋里者，詢及起居，知精神矍鑠，須髮宣狀，訢甚尉甚。麟自四月中泮署寓會城，塵俗事繇，稍曠故業，甫于六月初旬，校杜氏《通典》畢。此書舊無善本，浙局所彙，譌繆不下千條，因上溯諸史，下沿《通攷》，參互甄綜，輒為點定。世無惠子，不欲示人。今爍杖履南來，當呈懣正。吳中近設中西學堂，能以母制子否？舉世皆談西學者，無阮儀徵、巍邵陽之識，吾道孤矣。漆室悲時，端憂多暇，復取周秦諸子，櫛罩西書，除張力臣《瀛海篇》所疏，又得二十許條，匏瓜徒懸，無裨宙合，聊以張漢赤幟，亦俟爍日呈之。《萼在堂全書》之刻，頃與小槎議定，入局四人，通力合作。維陽紙貴，今非其時，惟冀藉

①《制言》，民國二十六年第三十二期。

②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③杨叶：《章太炎先生的妹妹、妹夫及外甥》，杭州《城乡导报》2013年3月4日第7版。

④陈永忠：《革命哲人——章太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⑤《太炎自述历史之一段》记太炎外祖父“朱有虔”作“朱有泉”（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第2922号拍品。笔记为朱希祖长子朱楔手迹，旁有别一笔迹记云：“廿五年四月廿八日在苏州太炎先生座上所得，同时有朱逊先君，笔记者乃朱君之长子也。”与信封笔迹同。按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希祖与张溥泉同问本师少年事迹”云云，知旁记者为张继，此件乃其所藏）。

⑥西泠印社2015年春季拍卖会第2102号拍品。

此涓塵，沾溉來學，其中曲折，小槎自能言之，不更瑣瀆。肅稟，恭請道安！

受業制章炳麟上

按，太炎《自定年譜》云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遷居會城^①，與此札“自四月中浣遷居會城”吻合，當作於是年。會城即省城杭州。按《忘山廬日記》，孫寶瑄次年四月訪太炎於橫河橋北，“板屋數椽，亦雅潔”^②，似即太炎遷居之所^③。又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初二日（1895年11月18日），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孫樂文在蘇州宮巷開辦“中西書院”^④，即東吳大學（今蘇州大學）前身，“吳中近設中西學堂”或即指此^⑤。札云“甫於六月初旬，校杜氏《通典》畢”，並俟秋日“杖履南來”，則此札作於六月中旬以後。

本年浙江巡撫廖壽豐飭杭州各書院監院合議，欲變通書院章程，兼習西學，曲園有致廖壽豐書陳議，並云：“欲士子通曉西學，則江蘇見行之中西學堂，其法甚善。”^⑥《春在堂詩編·甲丙編》本年七月以後亦錄有《七夕戲作》、《告西士》五首、《詠古》三首，皆長歌也，致慨於西土奇巧流毒深遠。繆荃孫《俞先生行狀》云：“先生晚歲忧伤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為體者道也，以西學為用者器也。’”^⑦

本年七月十日《上譚獻書》云：“麟前論《管子》、《淮南》諸篇，近引西書，旁傳諸子，未審大楚人士以僉父目之否？頃覽嚴周《天下篇》，得惠施諸辯論，既題以歷物之意，歷实训算，傳以西學，正如閉門造車，不得合沓。分曹疏證，得十許條，較前說為簡明確凿矣。”^⑧此札云“取周秦諸子，籠罩西書，除張力臣《瀛海篇》所疏，又得二十許條”，事亦相應。張自牧（1832-1886）字力臣，一作笠臣，湘陰人，著有《瀛海論》一卷、《蠡測卮言》一卷。太炎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東方格致》謂：“晚近說者，或謂泰西格致之學皆出東方，蓋自張自牧《瀛海論》創之。彼於希臘、巴比倫之說，未嘗目睹，而以此張大其詞，矯誣實甚。”^⑨

又太炎上譚獻、曲園二書云所得十許條之疏證，即《歷物疏證》《附辯者與惠施相應光學三條》，見《膏蘭室札記》卷三，皆稱近作，疑撰於本年夏日。然則《膏蘭室札記》或當撰定於光緒二十二年以後。沈延國《膏蘭室札記校點後

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第4頁。

②《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8頁。

③章燾《憶先父章太炎》又云曾居住下城木柵弄，未知為寓居之所或遷居之所。

④吳竟：《略談東吳大學建校經過》，《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1期。

⑤另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國《吳縣志》卷二十八“學堂”，云於蘇州府治南、滄浪亭北可園營建校舍，初名“中西學堂”，其時已是光緒二十六年，顯非指此。

⑥俞樾著，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85頁。

⑦《藝風堂文續集》卷二葉七，清宣統二年（1910）刻民國二年（1913）印本。

⑧《章太炎書信集》，第2頁。

⑨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補編》，中華書局，2013年，第599頁。

记》云《札记》为光绪十七年辛卯、十八年壬辰、十九年癸巳诸岁札录，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据之系于十九年癸巳之下，并云太炎该年已研治西学，恐有不确。《札记》随日札录，以时间为次，沈氏据《札记》卷二第三〇八“五藏所属同异”条下“以下癸巳十月下旬记”自注，遂定第三〇八条以下及卷三均作于十九年癸巳。今考《札记》卷二第三七三“束矢”条，又见于《诂经精舍课艺八集》卷三（题为《束矢解》）及《太炎文录初编》卷一（题为《说束矢白矢》），经比勘不难发现，《札记》较《八集》有所修订，而《文录》前半部分几乎全同于《札记》并稍有增益，其先后之次不言自明。《八集》所收为光绪二十年甲午至二十二年丙申三年课艺，是《膏兰室札记》卷二已有作于甲午以后者。太炎尝云：“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①盖非虚言也。

《自定年谱》谓光绪十六年求《通典》读之，后循诵凡七八过。至本年已点校一过，并勘正浙江书局本讹缪不下千条，可见太炎对《通典》用力之深，故云：“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②从日本返国，光绪二十六年致书宋恕云“归后复治《通典》”^③，二十八年《自定年谱》又云：“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④盖学问所造，得失知在寸心。按浙江书局本《通典》刊成于光绪十七年。

太炎精于校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夏所刻《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十二卷，每卷卷末均有“章炳麟校”字样，可见由太炎一人担任校讎，本年《上谭献书》亦云“斟书纂志，非甚难觅”^⑤。曹树培字慕蘧，号小槎（其父曹沅字仙槎，曲园有《仙槎曹君传》），钱塘人，肄业诂经精舍，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光绪二十三年夏，太炎为杨誉龙（字云成）《素行室经说》作序云：“余少治汉学，与杨君云成、曹君小槎最亲密，每取一故训，证一成事，相说以解。”^⑥曲园二十年《湖楼山馆杂诗》自注：“门下士曹小槎茂才以吾《全书》行世已久，而卷帙繁重，舟车携挈为难，谋用西法石印，以广流通。”^⑦是石印《春在堂全书》由曹小槎创议，至光绪二十三年印成，疑此札所述即石印之事。曲园《石印春在堂全书自序》：“门下诸君子以余书行远之难，创为石印《全书》之议。有姜子仁茂才者，用西人石印法设肆于杭，乃就而谋焉。不数月而书成。”^⑧《俞曲园先生

①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中华书局影印本，2006年，第785页。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6页。

③《章太炎书信集》，第16页。

④《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9页。

⑤《章太炎书信集》，第3页。

⑥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⑦《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09页。

⑧《春在堂全书》第4册，第649页。

日记残稿》光绪十八年三月初三日记：“冯梦香来，言杭人姜子仁茂才自购机器，设石印书局，余问其印值”云云^①。

此札当与本年七月十日《上谭献书》合观，时间不相远，所述多同，情绪亦相类，离开诂经精舍之念，自是已萌。

第三通

夫子大人函丈：

前上片言，小有陳請，計已鑒察。頃得孫君和叔書，知杖履不怡，忽兼旬日，聞之憂結勞積，不任道阻且長，參商睽隔，未得趨奉湯藥，陪侍几榻，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往讀《廢醫》一論，采陳古義，發人障蔕，以為華、吳復來，當令流汗。然竊以療飢之食，無待鼎鼐；拯溺之行，匪尚雅步。中下醫工，或可觀采。謂宜斟酌甘辛，輔以持養，乃後自和天堇，槩滌煩冤，大沖莫撓，遽然斯覺。想展書至此，當發大噱曰：“某之禱久也。”函抵精廬，計已脫愈，吉祥止止，振展行齡，延伫望之。

十一月十五日，弟子期章炳麟上

按，《春在堂詩編》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有詩題云：“今年十月，余在吳下病症，症止，又發氣痛宿痼，委頓異常。二兒婦姚晝夜奉侍，衣不解帶者，已月餘矣。”并賦《病中成生老病死四絕句》《生死問答四絕句》，又《病起試筆》詩云“偃仰胡床兩月寬”^②。李鴻章光緒二十年甲午二月二十四日《復詒經精舍山長前河南學台俞》云：“腊間接奉復書，聞患症甚數，慮非高年所宜，深為惦系。”^③高年患症，頓生生死之感，宜亦有書札告于精舍同人，故太炎得以聞之孫和叔也。此札末署十一月十五日，并云“杖履不怡，忽兼旬日”，與曲園所述時間相應，似作于光緒十九年癸巳。

《病起試筆》有“病情子母循環易，藥劑君臣配合難”句，自注：“陰陽虛實，病者不自知，何責醫者？余所以執廢醫之論也。”曲園嘗撰《廢醫論》，云：“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④故太炎上書勸其“斟酌甘辛”。十數年後，太炎避居日本，又謂“先師俞君僑處蘇州，蘇州醫好以瓜果入藥，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長子之喪，發憤作《廢醫論》。不怪吳醫之失，而迂怒于扁鵲、子儀，亦已過矣……故特取俞、鄭（文焯）兩家之說，匡其違誤，舉其正則”^⑤，遂作《醫術平議》，刊于1910年《學林》第二冊。

“自和天堇”句，語出《管子·五行》：“修概水土，以待乎天堇。”曲園《諸

①《春在堂全書》第7冊，第780頁。

②《春在堂全書》第5冊，第204頁。

③《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頁。

④《春在堂全書》第3冊，第755頁。

⑤《章太炎全集》第八冊醫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頁。

子平议》从尹知章训作“天诚”，似非此札所指。太炎《膏兰室札记》卷二“天堇”条训作“天时”，“天时和”乃医家习语，或即太炎此处之意。《膏兰室札记》该条记于本年十月下旬以后^①，盖太炎新得之解，后亦收入《管子馀义》。

孙树礼（1845-1936），字和叔，号踽庵，撰有《文澜阁志》（与孙峻合撰）、《踽叟诗稿》、《踽叟秕草》等^②。时任诂经精舍监院，见《诂经精舍课艺七集序》。

第四通

夫子大人函丈：

三月閒以《左傳讀》塵覽，旋受誨函，教以無守門戶，且謂立說纖巧，甚難實非，讀之不禁汗下。既而思之，耕柱馭驥，以其足責，或不以庸鄙見待，又忻躍無既也。學問疏賤，索居黽友，近遂付棗，冀遇有道，糾其敦戾，令得用諤，故非自炫。謹陳十部，幸不撻還。麟疴疹相纏，又遭天倫之戚，（家姊病歿，益無聊賴。）憂疚箸胃，面有墨色。側聞精舍高材，十闕其二，爾來文宗垂意，未遇其人。以麟駑鈍，自愧捷足，惟受經門下，先後四稔，邪理之木，匠石未弃，儻可聞其長鳴，加意翦拂，寓書推轂，為作曹北，使得專意讀書，無營薪水。斯事文宗主政，比于校書一席，差為容易。近時讀書旁午，慮有先我得鹿者，如蒙省覽，惟不度閣為幸。秋氣叢急，惟興居萬福，餐衛皆吉，無任戀戀。

受業大功章炳麟上

七月二十六日

按，太炎长姊卒于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七月二十六日^③，此札作于其病歿之日，故在札末具名上添写“大功”。郑逸梅《尺牍丛话》：“居父母丧致人书，具名上旁须添写棘人（百日内）、制（百日外），他如期服具名上旁添写期字，功服写一功字，缙麻写一缙字。”^④《仪礼·丧服》：“大功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⑤《大清会典》卷五十四《丧礼五》云：“凡服制，大功九月者，为姊妹之已嫁者。”^⑥札云“受经门下，先后四稔”，时间亦合。

谭献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日记：“为馮杭章生炳麟枚叔呈杂文三篇，章生幼学善病，尝撰《春秋左氏传》，有志治经。前年杨春圃以所作文字质，已略指正之矣。”^⑦“前年”正是本年。据谭献日记，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赴武昌，七月初

①沈延国：《膏兰室札记校点后记》，《章太炎全集》第一册《膏兰室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

②杨叶：《馮杭孙和叔（树礼）先生卒年考》，杭州《城乡导报》2012年12月3日第7版。

③章太炎：《姊朱君恭人诔》，西泠印社2015年春季拍卖会第2102号拍品。

④《尺牍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⑤《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四部精要》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2页。

⑥《大清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1页。

七日返抵杭城^①，疑向谭献求正之时间在赴武昌之前，否则返杭后，《左传读》殆将印成或已经印成，宜呈印本也。太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新正上书谭献，方附奉印本。然则三月间呈曲园之前，已向谭献呈览，此盖第一通所称募启之初衷。

钱玄同 1938 年《与顾起潜书》云：“先师章君之《春秋左传读》，弟于三十年前曾在师处见其自藏之本，其后向先师之兄仲铭丈乞得一部。书系缮写石印，板式及大小，略如石印《清经解》正续编。各卷系两人分写，一字迹稍大，体较古雅，系先师自写；一字迹稍小，体较凡俗，盖抄胥所写。书签为冯梦香一梅篆书。”又云：“民元二年间识仲铭丈时，虽曾乞得一部，但铭丈已云家中仅馀数部。今又阅廿余年，铭丈下世亦近十年，以后恐绝难再得矣。”^②今国家图书馆藏《春秋左传读》石印本（著录号 3045），书衣题“癸丑六节丙辰蕡心孚，钱夏”，并钤“钱夏”名印（卷一钤有“康心如臧书印”，知后为康心孚之弟康心如所藏），与致顾廷龙书所述无不吻合，即《春秋左传读》之初印本（《钱玄同日记》1912 年 11 月 28 日也曾提及），钱玄同谓其“出板当在戊戌以前”^③。又癸丑六节丙辰是阳历 1913 年 6 月 4 日（惜本月钱玄同未作日记），与向章仲铭乞得之时间相合，颇疑钱氏乞得后转赠康心孚也。今国图藏本著录时间为民国初（另一本著录号 63064 者同），姜义华《春秋左传读校点说明》云“太炎在清末倩人誊录一过，一九一三年其学生将誊录稿缩小石印”^④，殆因书衣钱玄同“癸丑六节丙辰蕡心孚”题赠语，遂误以该年由太炎学生所印。1913 年石印《左传读》，未见记载；又太炎因为少作，欲重新编次，故生前未再刷印，直至 1939 年方由潘景郑影印百帙。潘氏跋云“得姊夫顾君起潜之力，自故都觅假一本”^⑤，盖即钱玄同与顾廷龙书所谈论者。

太炎本年三月向曲园呈《春秋左传读》，请序不获，遂付石印。札云付刊，定是石印，盖石印周期短，故能三四月而竣工。且是缩小石印，以省工物之费，此札云“使得专意读书，无营薪水”，盖亦有乏资之忧。可知，《春秋左传读》书成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并于七月以前石印行世。

今国图藏石印本首为《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即第一通所谓“又驳刘申受书，以明《左氏》原委”者，太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与刘光汉书》亦云：“曩时为《左传读》，约得三十万言，先为《叙录》，以驳申受之义。”^⑥后收录《章氏丛书》者修订较大。次为《春秋左传读》九卷，除卷九末页“重定鲁于是始尚羔说”一条外，条目均无标题。姜义华整理本即以之作底本，收录八百八十七条，

①《复堂日记》，第 366 页、第 371 页。

②《制言》，民国二十八年三月第五十期。

③《制言》，民国二十八年三月第五十期。

④《章太炎全集》第二册《春秋左传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 页。

⑤章氏国学讲习会印：《春秋左传读》，民国二十八年（1939）12 月印本（民国廿九年四月赠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五十四部），国家图书馆藏，著录号 64706。

⑥《太炎文录初编》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46 页。

减去据《续编》手稿增补之二十条,计八百六十余条,与第一通“日积月累,得《左传读》八百余条”相合。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云:“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由是锋芒乃敛。”^①亦与所受曲园函海及第一通所述相合。可知国图所藏之钱玄同赠本即是本年石印之本。

而《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二十九岁下云:“作《左传读》。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谭先生好称阳湖庄氏,余侍坐,但问文章,初不及经义。与穗卿交,穗卿时张《公羊》、《齐诗》之说,余以为诡诞,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其后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氏古义,至是书成。然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删不用,独以《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行世。”^②前引吴承仕跋承年谱之说,谓《左传读》“属稿早就,醵资刊布,盖在光绪丙申之岁”,今国图藏本应非该年所成之别一版本。兹举二事如下:《左传读》九卷,例同《膏兰室札记》,所见辄录,以时间为次。今与《诂经精舍课艺》七、八两集相比勘,《七集》所收为太炎光绪十六年庚寅至十九年癸巳课艺,其中《鲁于是始尚羔解》,对《左传读》卷六“范献子执羔”有所增订,《左传读》石印本卷九末页又有“重定鲁于是始尚羔说”一条,复对《鲁于是始尚羔解》重作修订,从笔迹看,显系全稿誊定后,最后补加者。是《左传读》石印前,对光绪十九年癸巳以前之课艺所得,有作修订。《八集》为光绪二十年甲午至二十二年丙申课艺,有增订《左传读》者,如《僖二十年西宫公穀异义说》之于《左传读》卷四“己酉西宫灾”,《所侠也解》之于《左传读》卷八“挟卒”,而《左传读》并无对《八集》所收作修订者。又石印本书衣有冯一梅题签,考冯一梅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以前在精舍^③,后任衢州正谊书院山长^④,次年春已在衢州,曲园《乙未春日寄冯梦香孝廉》诗有“闻君今又客衢州”之句^⑤,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仍在衢州^⑥,则冯一梅篆书,当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以前题写。

《自定年谱》云光绪二十年甲午二十七岁“始与钱唐夏曾佑穗卿交”^⑦,前引谭献日记,光绪十九年初,太炎托杨春圃转呈《左传读》文字向谭献求正,知

①转引自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83页。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4页。

③曲园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致陈豪书提及冯氏尚在西湖(《俞樾函札辑证》,第22页)。

④林艺:《追忆敬爱的祖父——林启》,《林社九十周年纪念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5期。

⑤《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13页。

⑥见后第九通书札。又曲园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余主讲经精舍讲席至今岁三十年矣开课之日慨然有作》诗自注:“黄元同、冯梦香皆诂经肄业生,今皆书院老山长矣。”(《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26页)

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4页。

太炎与谭献始交,亦在光绪十九年癸巳以后。则太炎“遍寻荀卿、贾生、太史公、张子高、刘子政诸家左氏古义”,当在甲午以后,也即《刘子政左氏说》撰于《左传读》成书之后。又《左传读》石印后,太炎续有修订,今藏上海图书馆《春秋左传读续编》手稿,二十三页,二十条,二万馀字,或新得,或补充例证,或改订前说,并有对《诂经精舍课艺七集》所收《荆尸解》作增订者,姜义华整理本已增补至《左传读》相应条目。《续编》是否仅此二十条,抑或尚有散佚条目,暂不可知。然则太炎谓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书成者,似合《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续编》《春秋左传读叙录》及《刘子政左氏说》等而言之,或总名之为《春秋左传读》。

太炎撰《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驳箴膏肓评》一卷,叙曰:“尝作《左传读》,粗有就绪,尤未成书。乃因刘氏(逢禄)三书,驳《箴膏肓评》以申郑说,砭《左氏春秋考证》以明《传》意,砭《后证》以明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妥。”^①《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下逐条驳正,即是《后证》,此三书作于同时,皆在《左传读》成书以前,即光绪十九年癸巳以前也。《驳箴膏肓评》手稿封面题“摄提格夏日至下旬陆沉居士自署”^②,太岁在寅日摄提格,疑此三书撰于光绪十六年庚寅前后。

太炎此札请曲园寓书推毂者,盖具备以下数事:一、为精舍高材;二、由学政主其事;三、可专意读书,并有薪水;四、较校书一席容易获得;五、求请者多;六、有曲园推毂,则较易得也。按章桢《临海尤君行略》:“君讳莹,字麓孙,姓尤氏。闻其能治经,箸籍曲园先生门下,先生亟赏之。癸巳之冬,余寓居杭中褚逊之明经家,君来访,曰新从台中来,愿同居,可乎?余言于逊之,逊之虽寒士,然重客,又夙耳君名,遂下榻焉。甲午,曲园先生以其精校讎,荐于浙江官书局,未得当。寻言于学使,调入为诂经精舍住院生,月给以膏火。”^③尤莹不幸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月病歿,则精舍又空出一席。曲园于秋时来杭时方知悉此事,该年十二月初四日有浙江学政徐致祥(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至二十三年丁酉八月任浙江学政)致曲园书,云:“尤生品学俱纯,素所深悉,闻其物故,悼惜久之。寿生复恭,克敦内行,足见器识不虚。诂经所遗一席,已遵谕札送矣。”^④寿生即寿锡恭。显系曲园致书推举,徐致祥遵从札送。

太炎亦精校讎(已详第二通),此时亦寓居杭城。曲园向浙江官书局推荐尤莹任校讎之役,未能得当;不久向学使徐致祥推毂,即将尤莹调入为精舍住

①《驳箴膏肓评》,《章太炎全集》第二册,第899页。

②《章太炎全集》第二册卷首插页。

③章桢:《一山文存》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三辑,第32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08-310页。

④上海图书馆编:《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下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8-159页。

院生,即札云“斯事文宗主政,比于校书一席,差为容易”。尤莹事与此札所述,合若符契,盖太炎申请取为诂经精舍住院生也。

《诂经精舍志初稿》谓“精舍肄业生,最初当一例住院(除省垣本城人外)”,其后著籍者渐多,“同光以后,省城诸书院既各有名师主讲,又膏火津贴,旧著优渥,故寒素劬学之士,多有以应考为博升斗之资者”。自他府州县来肄业者,则多须寓居杭城。《诂经精舍志初稿》记光绪二十年精舍经费云:“掌教束脩,年奉六百两;监院月薪二十两。学生则高才十六人,每人月给廪膳银六两。”所谓高才十六人,盖即住院高材生也,当是定额。其时内课二十五名,外课二十名,另有附课生,则寓居杭城之生员不在少数。住院高材月给廪膳六两,若有课试膏火,月可得七八两,自无柴米之虞。请书旁午,固其宜矣。

校书一席,疑指曲园所兼管浙江书局之助校或分校^①,太炎长兄章炳森即曾任校讎。《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光绪十八年壬辰三月十五日记:“崧镇青(骏)中丞以余侄孙箴玺充书局分校,月给洋钱十二,此中丞之美意也。然自戊辰岁,前抚马端敏公(新貽)必欲延余主诂经讲席,因诂经脩薄,以书局裨益之。自是以来,余尸素局中,为日久矣。今又以孙辈滥南郭之竽,殊觉内疚寸心,外惭公论也,即作书致谢中丞,并陈此意。”^②由此亦可知入书局较难,崧骏时任浙江巡抚,浙江书局盖由巡抚主政。月给洋钱十二,较住院生廪膳六两为优渥。

然而太炎迄未能住院,其《与尤莹问答记》:“台州尤莹字逮孙,与余同事俞先生,勤学好下问,处杭州诂经精舍,虽岁时游宴不出也。距今七岁,八月上弦,余送客江干,逮孙适至……宿留歆歆,夕乘竹梟而返。”^③《太炎集》系此文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则所述为二十年甲午或二十一年乙未八月事;曲园《尤麓孙传》云尤莹于乙未年秋归临海。可见太炎光绪二十年前仍未住湖上,至二十二年四月则已迁居杭州。

如此札所云,未能住院,则需自营薪水。诂经精舍膏火津贴丰厚,虽不住院,若课艺优异,可获膏火奖金。如章桢与太炎同时在精舍,光绪二十年离去,曲园《章君子三墓志铭》:“章氏子桢,余门下士也,学成,就书院试,得膏火资颇优。”^④《诂经精舍志初稿》载,光绪二十年九月,徐琪(花农)斥银两千两生息,加广考课膏火,则当较章桢时更为优渥,其时考课月额为,“内课每名膏火银一两二钱,外课每名六钱,附课无定额,不给膏火。内课前十名,自应得膏火外,第一名加给笔资二两,并奖洋四圆,以次至第十名,则人各加笔资各一两二钱,另奖银二圆。”太炎以经学见长,《诂经精舍课艺》七、八两集所收,合计三十八篇,为侪辈中最多,所得膏火津贴,当亦丰厚。又《雷塘庵主弟子记》嘉庆

①宋立:《浙江官书局研究》之《人员组织构成》一节,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

②《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86页。

③《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44、46页。

④《春在堂全书》第4册,第588页。

二十五年(1820)记云:“学海堂加课,仿(阮元)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奋兴,有佳文一卷而给膏火数月者。”^①虽年代较早,至光绪时已有更革,而诂经精舍膏火之制,可略见其梗概焉。

然而即如尤莹,已经住院,因“善病,人不敷所出,每病中作文,应课以自给,精力亦渐耗损矣”^②。太炎亦体弱善病(如第七通,谭献日记谓其幼学善病,太炎自述亦屡言之),家境并不丰盈,本年又得一女,生活情状殆可想见。今检《申报》,知太炎从光绪二十年甲午至二十二年丙申三年内,应上海、宁波等地书院季课,计有十六次。应旧学季课十四次,皆取为超等、特等,例当得膏火;应格致书院新学季课两次,皆一等末列,无有给赏。此仅为《申报》见载,并登名录者。光绪二十年甲午上海求志书院春夏秋冬四次季课,诂经精舍生徒中同在名录者,还有杨誉龙。章侵尝自述云:“侵自二十一岁时游学省城诸书院,仰膏火为菽水,岁入稍裕,府君累诫曰:‘考课废学,毋徒喜小利。予欲尔学,予不欲尔以博膏奖为能也。’”^③游学省城,仰给膏火,盖当时寒苦而好学者资生之一途。观此,太炎草拟书札时之心境不难想象。

太炎与长姊感情甚厚,《太炎文录续编》卷五之下《乐清朱母陈太夫人墓志铭》:“自念少壮尝趋候长姊,姊适病困,不时见,去宿他所,诘旦复往候,而姊歿矣,恸不能止。自是每梦姊,明日必作疾,眩冒闷绝,更五六岁始已。”^④今新见太炎《姊朱君恭人诔》手迹一件^⑤,哀毁慉怛,读之泪落。由诔文可知,太炎因患癫痫,出门时或僵仆道旁,不能依托于族姻,惟寓居长姊之家,得以在杭求学。今长姊病歿,乃长叹“而今已矣”,靡所寄托,恐不得继续在杭求学。故于病歿当日,即向曲园上书请住精舍。有志求学,痼病相缠,迭遭父姊之丧,身无聊赖,惟冀本师之推毂,假一枝以暂栖,其身世之感,恳切之情,愈加难以言状矣。

曲园《尤麓孙传》云:“(光绪十四年戊子)始至省城,肄业于诂经精舍,余初不之识,然其名则屡在高等,于是始异之。麓孙性纯笃,读书外无他好。时王益吾祭酒辑《皇清经解续编》,甫行于世,麓孙以其书繁重,检阅非易,为作目录,以便学者。推而及于余所著《春在堂全书》,以余书卷逾四百,读者颇有望洋之叹,因亦为作目录。”^⑥尤莹于光绪十八年壬辰二月二十九日谒见曲园,曲园是

①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557册·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②章侵:《一山文存》卷六《临海尤君行略》,第310页。

③章侵:《一山文存》卷七《先府君行述》,第347页。

④《章太炎全集》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页。

⑤西泠印社2015年春季拍卖会第2102号拍品。

⑥《春在堂全书》第4册,第513页。

日记：“尤麓孙莹来，诂经肄业士也，欲为余《全书》作目录。”^①揣其辞气，似初识于此时，则尤莹至精舍已四年矣，又两年而调为精舍住院生。盖因精舍授业，以评阅课艺为主，讲授实少，与太炎后来在日本、在苏州国学讲习会不同。住院高材生偶或面承教泽，其他生员与曲园当较少谋面，且曲园仅春秋两度莅杭，停留一二月，又往来于湖楼、山馆之间，且在湖上应酬亦多。曲园光绪十八年春莅杭之每日行止，《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有完整记述，可略知其概。太炎第一通云“星历三移，僻居下邑，未得一侍董帷，亲奉几杖”，并附名字、籍贯、居址，颇似通姓名以为“名刺”，故俞平伯跋谓“似为初通音问之品”。

然请序之札，附居址固为覆函投寄，表字、籍贯，又似便于撰序时相称，未必即是初通音问。而第一通又称别有募启一编，表字、籍贯似宜于募启中著明，不必附于札末，则又似初通音问。两皆可能，谨此志疑。

上引曲园《尤麓孙传》云“初不之识，然其名则屡在高等，于是始异之”，尤莹早太炎两年入精舍，而《诂经精舍课艺七集》仅收其六年间课艺七篇，收太炎四年间课艺有十七篇，则曲园对太炎之注意、雕饰，当可想见。

《诂经精舍志初稿》又称因肄业者渐多，“而其时定制，又复视前为宽，应试者寄卷即可，无须莅院”。是精舍有寄卷之例，而太炎应上海、宁波等地书院季课，则必是寄卷。第一通云“僻居下邑”，未知太炎寓居姊家之前，应诂经精舍课艺，为偶至杭州抑或在余杭寄卷；章弢《忆先父章太炎》又云曾居住杭州下城木柵弄，未知在寓居姊家之前或之后，均阙疑待考。

第五通

夫子大人函丈：

初七日拜誦諭函，并《管子續編序》、《春在堂壬癸編詩》，振董受讀，惶悚莫名。所著已改稱《管子平議續編》，示師承所自，且使名實無相譾也。夫子主持經運，維繫名教，使中夏士人，不至相率而趣景教，此猶漢季有盧、鄭兩公，而釋氏不得盛行于世，其功如曲突徙薪之難見，而非焦頭爛額以得顯績者比也。達而在上有相國，窮而在下有夫子，功蓋寰區，正足相配，隨園文士，蓋何足云。乃所題女弟子請業圖，猶有謙讓未皇之語，將非執雌持下，不欲碌碌之名邪。抑江海善下百谷，故為百谷王也。且夫千秋之後，夫子與隨園皆受不朽盛名，而必不如隨園之廣，何者？學人之名常不逮文士，以學人惟見重于士夫，而文士則一觴一詠，雖邨童里媼，猶悉其名，事執然也。童子齟齬受書，二三季後，知唐人有杜甫、李白矣。有皓首為塾師，而不知唐人有孔穎達、賈公彥者也。由此言之，細行受大名，大行受細名，蓋古今皆是矣。雖然，務多者在名，而貴當者在實，謹譟之口，君子以為風之過簫也。處人席上，進方領之士而問之，孰敢謂賈孔不如李杜哉？陪姬孔之杖履，享國家之俎豆，上自岳牧，下至守令，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惟

^①《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78页。

賈孔也，而李杜不得與也。夫子于此，可以無感矣。且夫子于經術之外，兼擅文辭，北江、臬聞，猶將避舍，而況隨園之有華無實者哉。麟嘗欲爲夫子作文一首，見以經術攘序異學之功，使後有巍默深輩，不敢薄訓詁攷訂爲無用。而覽揆之辰，尚須六載，倉猝無他事可以發揮此指者，幸而有瑣事可以命屬文，則願畢力竭思，自效其慙愚焉。護院當已晤及，肅稟，敬請道安，不宣。

弟子期章炳麟拜上，初九日

按《春在堂壬癸編詩》即《春在堂詩編》卷十四《壬癸編》，收录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九年癸巳兩年詩作，則此札作于光緒十九年之後。准此，則札中“覽揆之辰”，當指曲園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十壽辰，“尚須六載”，則在光緒二十年或二十一年。

護院乃劉樹堂，字景韓，官至浙江巡撫。光緒十七年辛卯至十九年癸巳任浙江布政使，時崧駿（字鎮青）任浙江巡撫。《東華續錄》光緒十八年壬辰二月十六日乙巳：“召崧駿入覲，以劉樹堂護理浙江巡撫。”^①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曲園日記：“送鎮青中丞之行，賀劉景韓護防……之喜。惟見景韓護院一人，餘均未見。”《東華續錄》光緒十九年癸巳十二月初二日庚戌又記：“以廖壽豐為浙江巡撫。調劉樹堂為河南布政使，以趙舒翹為浙江布政使，聶緝槩為浙江按察使。”^②劉樹堂至二十年甲午春方赴任，曲園有《送劉景韓方伯移藩汴梁》詩。曲園光緒二十年甲午二月二十四日發蘇州（見《湖樓山館雜詩》第一首自注），四月十五六日離杭返蘇^③，期間作《湖樓山館雜詩》五十首，第三十首為“送去劉公是，旌麾到汴中。山人入城市，誰授歛烟筒”，自注：“劉景韓方伯每見余，必命侍者進烟筒，時移藩汴梁，余往送之，臨別依依。余謂之曰：‘此後入城無以此進者矣。’”^④《春在堂詩編》以時間為次，該詩之後第三十一首作于四月八日，是劉樹堂離杭之日蓋在四月八日前不久。太炎初七日拜誦曲園諭函，初九日作此札，札末既詢護院是否晤及，則曲園其時亦在杭州。曲園春秋兩度來杭，秋時劉樹堂已在河南；又光緒二十年廖壽豐已赴任^⑤，二十一年已無護院，則此札作于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初九日或四月初九日^⑥。札末具名上有“期”字，與第三通同，時間亦合。

①《東華續錄》卷一百九葉四，《續修四庫全書》第3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0頁。

②《東華續錄》卷一百十六葉十四，第484頁。

③俞陛云本年赴京會試，清制四月十五日放榜，《湖樓山館雜詩》第四十九首自注：“歸舟泊嘉興城外，游落帆亭，得電報知孫兒陞云又下第矣。”（《春在堂全書》第5冊，第210頁）

④《春在堂全書》第5冊，第209頁。

⑤《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第1734頁。

⑥又《湖樓山館雜詩》第十七首作于四月初五日，則劉樹堂離杭似在初六、初七、初八三日間。竊疑此札作于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初九日，蓋太炎亦知劉樹堂離杭不久，順問曲園是否曾及一見。姑存一說。

《春在堂诗编·乙巳编》有诗题云：“日本儒官岛田彦桢（翰）过访敝庐，求余所著各书稿本，盖奉其文部大臣久保公之命也。余笔墨草率，不自收拾，除两《平议》稿已援唐刘蛻文冢之例，埋之右台山，此外各书随作随刊，刊后稿本即拉杂摧烧之，无复存者。余孙陞云竭半日之力，搜寻敝篋，仅得《杂文》《诗编》《尺牋》《随笔》稿本各一卷，聊副其意而已。”^①是知曲园著作，随作随刊。又《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记光绪十八年壬辰三月事，有云：“五日，石林书来，以小照乞题，率笔题其端，诗不存稿，姑录于此。十六日，冯梦香以便面求书近作，走笔赋一诗赠之……其诗不存于集，姑记于此。丁松生以上海新建应敏斋廉访祠求撰柱联，亦走笔成一联……此联不载入集中，亦记于此。二十三日，得周子云书，以沈烈妇生卒年月来告余为作传，并为诗，均存集中，又记其崖略于此。二十七日，是日往返五十里，舆中口占一诗，未必可存，姑录于此。”^②是《春在堂诗编》《杂文》《楹联录存》等，且随作随编，故太炎本年春即获读《壬癸编》。

《壬癸编》有诗《吴季英以所藏随园十三女弟子请业图索题率书四绝句》，其四为“曲园何敢比随园，未许山庄旧例援。却笑合肥贤相国，强从师友较渊源”，自注：“新得合肥相国书，以余与相国并出曾文正公门下，引邓逊斋语门下一文一武为比，而又自谓过之。姑存此说，俟后人论定耳。”^③题诗作于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七日之后。相国李鸿章致曲园书为二月十三日所作，云：“见示《东海投桃集》，以鄙人妄附名贤，实本当日文正之语。孔门并列四科，回赐不言官阀。近代邓逊斋，自夸门下共得一武一文，谓广庭与随园可为比例。二公皆登大耋，亦是吉征。鄙人敢拟阿公，执事经术则过简斋远甚。邓公虽登九列，然非后世有为衰学者，必无人知其姓名，岂若文正，一代宗臣，百世景仰。今人胜古，自信非夸。”^④《东海投桃集》恒以李鸿章与曲园并论，岛田重礼文有云：“时则有若曾文正懋德粹学，勋业冠世，其他材臣硕彦，不胜俚指，而其存在今日，灵光岿然为一代标望者，以余所闻，勋臣则李少荃相国，师儒则俞曲园先生，此其尤显著者也。”^⑤曾国藩语见《春在堂随笔》卷一。邓逊斋即邓时敏；阿公即阿桂，字广庭。曲园于三月十六日收到李鸿章书札，是日日记云：“相国来书，有今人胜古之语，或言大而非夸乎？”^⑥虽谦让，犹流露自信之意，是以录存《春在堂诗编》。

时人多以曲园与随园比况，甚至谭献讥评曲园，犹曰：“小言破道，私智盗名，谬种流传。经生有俞樾，犹文苑之有袁枚矣。”^⑦即曲园亦曾以随园事相媲^⑧。

①《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340页。

②《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81-791页。

③《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196页。

④《李鸿章全集》第35册信函七，第323页。

⑤《东海投桃集》，《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600页。

⑥《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86页。

⑦《复堂日记》，第254页。

⑧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而曲园又尝致书李鸿章，直谓随园“其人品，其学术，均非樾所心折”^①。缪荃孙《俞先生行状》云：“世俗耳食多以曲园比之随园，雷同相和，所谓貌同心异。有道于通人之前，宜不值一哂也。”^②清世自戴震入四库馆以后，渐重经儒而轻文士（见《馥书·清儒》），褒贬之意寓焉，持议盖与太炎相同。

曲园一生拒收女弟子，光绪三十年甲辰有诗《江右女史张蕊仙佩兰至吴求见投诗四首余和其三以谢之》，其一：“八十四翁行就木，虚名浪窃本非真。曲园不是随园叟，莫误金钗作赘人。”其二：“何意红闺亦好名，门墙争愿拜先生。当年力谢刘三妹，此志兢兢未敢更。”自注：“江北刘古香女史愿为女弟子，余谢却之。”^③

由此札可知，太炎曾撰《管子续编》，后改名《管子平议续编》，并得曲园作序。今《管子余义》体例同《诸子平议》，师承有自，似由《管子平议续编》而来。曲园之序，盖多褒誉之辞，使得“惶悚莫名”，与《左传读》不同。而《春在堂杂文》未收此序，太炎手订《管子余义》亦不用，复改称书名，且极少提及曲园作序之事，殊可玩味。

薄训诂考订为无用，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争治训诂音声，瓜剖钗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④太炎《膏兰室札记》卷二《驳书古微》云：“魏氏说《书》或得大义，而于小学疏陋至此，是以郢书燕说，往往而见。”^⑤又《馥书·清儒》：“邵阳魏源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⑥此札斥魏源薄训诂考据为无用，第八通讯其狂醒（光绪二十五年），而第二通称许其识见（光绪二十二年）。

第六通

夫子大人函丈：

階青來滬，敬諗興尻靜謐，餐飯有加，允符頌祝。前呈散文三通，計已登覽。昨閱日報，知瞿學使已于廿三日試畢，此件想可轉致。此公于古義新學，皆能折中，宜不至有所抵牾也。譚、廖兩公處，未識已發函否，二公幹濟雖不逾人，幸一係本省大吏，一亦頗有開原，或免于如水投石，且其心地無佗，不以游其門為詬病耳。時事日棘，海上有遷都之謠，大氏因董福祥節制三省看出。董本回裔，終不可以桓文望之，正恐一入彀阱，滿人生計盡絕矣。康黨梁卓如因病返滬，髮墮色槁，狀甚怔忡，西醫言用心過度，肺已損壞，須半年不作文見客，方可有瘳，而彼尚不忘會試，則前此之痛詆帖括，

①《俞樾函札辑证》，第164页。

②《艺风堂文续集》卷二叶七。

③《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300页。

④《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358页。

⑤《章太炎全集》第一册，第158页。

⑥《馥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

其可信邪？一笑。階青所屬排印不喫煙會章程，刻已藏事，計裝成千本，屬沈君子範寄京矣。專肅，即敬道安！

受業章炳麟再拜上，二月廿七日

按，俞陸云字階青，既云來滬，則此時太炎在上海。

瞿學使為瞿鴻禨（1850—1918），字子玖，號止庵，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至二十五年己亥任江蘇學政。《止庵年譜》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記有：“二月初一日出棚，先試蘇州府屬，次及太倉州、松江府屬。”^①查《申報》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二月二十六日，有“學憲起馬”之報道：“蘇州訪事人云，江蘇學憲瞿大宗師按試蘇郡，一切情形，均紀前報，茲悉宗師于十九日試事告竣。廿三日，宗師即排導出轅，詣撫藩臬織造各憲轅，及各當道處，投刺拜謁；各大憲即于是晚在滄浪亭設席公請。廿四日，本地紳董亦在滄浪亭公請宴飲，午後席散，宗師即飭起馬，至胥門外官馬頭登舟，往太倉進發。時撫憲以下文武各官及諸紳董，咸詣馬頭恭送。”札末署二月二十七日，與“昨日閱報”正相吻合，則此札作于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

廖為廖壽丰，時任浙江巡撫，即本省大吏。譚為譚鍾麟，時任兩廣總督，曾任杭州知府、浙江巡撫。任杭州知府時，太炎父章潛在其幕中，即頗有淵源。

曲園本年有致瞿鴻禨書札三通，其一云：“日前旌旆蒞蘇，紆尊枉顧，草堂促膝，快慰渴衷。比聞太倉試畢，想文旌又在峰泖間矣……小孫于廿九日始抵都門，蓋以在滬待船，故遲滯至此。今日放總裁，明日或可得信也。前面呈章、董兩生著作，今兩生各認專門，另單開覽。章炳麟素以經學見長，乃詁經高材生；董祖壽則閣下視學浙中以第一名取入學者也。”^②俞陸云本年進京參加會試，清制會試考官例于三月初六日簡放，本年亦然，則曲園此札作于該日。從太炎辭氣可知，二月二十七日前僅向曲園啟請發函譚、廖二公，知瞿鴻禨已離蘇，方向曲園函請。而曲園在蘇州晤面瞿氏時，已將太炎著作轉致。

其二云：“敬惟入伏來，絳帳論文，碧筒銷夏，興居佳勝，定協頌忱。秋后何時啟節，按試維揚？……特科限期舉辦，朝廷志在必行，未知夾袋人材已儲几許？前所說章、董、趙三士，似皆可登荐祿之章，公意何如？”^③此札作于伏后（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初伏），據《止庵年譜》，時瞿鴻禨在江陰駐署。本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諭：“經濟特科原期振興士氣，亟應認真選舉，着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舉爾所知，限于三個月內，迅速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④特科詳細章

①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419頁。

②《俞樾函札輯證》，第291頁。

③《俞樾函札輯證》，第292—293頁。

④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頁。

程中有“其有著述成编,及有器艺可以呈验者,一概随同咨送,以备察验”一条。开经济特科,正月初六日已有上谕,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无论已仕未仕,只要学有专长,有裨实用,由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送,参加殿试,听候擢用。《申报》正月十一日即将上谕全文登载。太炎三月中在武昌作《正学报缘起》,有云:“光绪二十有四年春,胶州湾既割,是时距辽东之战四年矣。天子方侧席求人材,开特科以致天下士,海内髦杰,踔跃陵厉,北向望风采,以为雪国耻、起民瘼,当在今日。”^①太炎此札请于谭、廖两公者,是否即是经济特科之事,尚有疑处,而瞿鸿禨莅苏谒见曲园,则似与储备人才,请曲园开单推举有关,故曲园此札及后一札,均询及夹袋已储几许、究储几许。经济特科需据所长认专门,故曲园三月六日札云“今两生各认专门,另单开览”,则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间,太炎与曲园当另有往复,以认专门。后闻有限期举办之谕,故曲园于伏后再次函请瞿氏荐举。

其三云:“金风应候,玉节渡江,想首指绿杨城郭矣……特科保举,理宜郑重,承示章、董二生,均从割爱。章生所持,往往多非常异义,至董生则本不足充上驷也。夹袋人材,究储几许?弟所知又有章式之孝廉钰,此君实是美才,学问淹博,见识阔通,向因其入都会试,故未及之,今特补闻。如公有意,乞问之赵君宏,伊亦深识之也。”^②可知瞿鸿禨已储赵君宏,未能保举太炎。此札当作于七月或八月初。八月六日政变发生,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懿旨停罢经济特科。绿杨,扬州也。《止庵年谱》:“八月十八日,再出棚,先试江宁府,次试通州并附考海门厅,次至泰州棚,试扬州府,次试淮安府,十一月初七日回署。”

太炎本年正月上书李鸿章,正月二十七日由杭至沪,二月请于曲园,三月初七日往武昌谒湖广总督张之洞,闰三月二十四日由武昌返沪,四月上旬至五月中旬在杭州,五月二十二日由杭抵沪^③。四月二十七日,又有宋恕上曲园书,为太炎说情:“同门余杭章枚叔炳麟,惓惓芬芳,正则流亚,才高丛忌,谤满区中。新应楚督之招,未及一月,绝交回里,识者目为季汉之正平,近时之容甫。今湘抚陈公,爱士甚,师可为一言乎?私切愿之。非所敢请也,非所敢不请也。”^④陈公即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或因此前又有宋恕之请,抑或因太炎旅居海上邮寄不便,被瞿氏推拒后,曲园后有两函寄付宋恕,似请宋恕向太炎转达推荐未果之事。宋恕七月杪复曲园书云:“两奉复谕。枚叔频见,师谕已先后袖示。此君持论颇有明于理而昧于势之病,然其志行之高,文章之雅,风尘物色,难得其伦。刻入《昌言报》馆,未卜能久居否?”^⑤“明理昧势”,与曲园复函瞿鸿禨“往

①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58页。

②《俞樾函札辑证》,第293-294页。

③《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所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④《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588页。

⑤《宋恕集》,第592页。

往多非常异义”之语亦相类。盖获悉不得举荐,即赴职《昌言报》馆。

曲园老人负海内之望,亦爱才惜才。观其书札,如致吴承璐、王文韶、盛宣怀等,引荐后学后辈,往往而有。外孙王念曾被漕督陈公保推荐经济特科,曲园《女婿王康侯及长女云裳合传》称“可云有子矣”^①,盖经济特科可以荣身荣亲。曲园是否向廖寿丰、谭钟麟、陈宝箴发函,一时无考,却在太炎函请之前,已将太炎著作转呈瞿鸿禨,并一再推荐,其为弟子谋求科目出身尽其心力有如此。

太炎本年上书李鸿章,并呈《迁都驳议》一篇。甲午以后,迁都移鼎,议论纷纷,谭继洵、康有为等主张迁都西安。

《申报》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西报议迁都事》:“近日《地球报》等有极要之消息,言中国总理衙门拟请迁都于陕西之西安府,虽官场中尚无的信漏出,我辈可信以为实,无容疑惑。”又《格致新报》本年第十期《论中国将来事》:“大清建都本在北京,今议迁至陕西西安府,集山民以为兵,则中国内地,与东偏诸省,虽仍为大清所辖,而北京一隅,已置之度外,无术可与俄争矣。岂知中国虽迁都于陕,若得国人归顺,亦可徐图恢复。又谣传皇太后有许多金银储于北京,恐为俄人所掠,已预备运往西安府。盖由北京至陕西,必经保定府,其地每段有官兵守护,其兵皆隶于甘肃董将军麾下,可保无虞。”

董福祥(1840-1908),清末将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甘肃河州、湟中等地爆发回族农民起义,《东华续录》记十一月二十九日乙丑上谕:“谕董福祥,着调补甘肃提督,仍着总统甘军,所有出敌将领,统归节制。”^②当时多流传董福祥是回民,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北京新闻汇报》转载《纪客述董福祥事》一文:“非有客自陕西来者,言去夏以来,各报所纪董福祥事皆不确,因举所闻以告。客固生西北,习知董事者也。”所述首句即云:“董福祥,甘肃固原州汉民,非回族也。”

梁启超《三十自述》:“戊戌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③不忘会试,梁氏光绪二十年致夏曾佑书尝自言:“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④

俞陛云赴京会试,盖由苏州乘船至上海,在轮船招商局订船,乘轮船至天津,再由天津进京。据曲园日记,俞陛云光绪十八年壬辰赴京,即在上海迁延六日,后乘驶行最速之新裕轮北上,二月十八日侵晨出发,二十一日抵津,停三日,二十四日行陆路^⑤,二十六七日当已抵京(沈家本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

①《春在堂全书》第4册,第547页。

②《东华续录》卷一百三十叶十八,第637页。

③《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页。

⑤《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73-776页。

五日日记,北京至天津需两日半^①)。由此推算,本年俞陛云在沪待船有所迟滞,至二十九日始抵都门,则与太炎在沪晤面,盖在二月中旬,并托排印禁烟章程千本。太炎《馥书》初刻本收有《禁烟草》一篇。

第七通

夫子大人函丈:

不奉教者两月,清谈博弈,学无寸进,幸就诊泰西人所,痼疾获除。然既亲异族,复信岐黄,犯夫子二戒矣。自大白经天以后,教案闾闾,旣方未已。长素欲设文庙于四夷,是亦龙战元黄之日也。顷闻朝廷变法,欲以策论代时文,生平好为古文,闻此亦乐。彼老学究辈,废镬终身,诚不足惜,所惜同学古义诸君,专研训诂,多有笔不遑述者,改就策论,恐有童牛角马之态耳。司马公取士法,令诸生各盡所长,此千古至论,即唐人亦有进士、明经二科。今若踵行,则经生不至窳老,否则驱天下为纵横之士,本朝汉学家言自兹绝矣。未知诸公建议,谁与为亲。又恐畏蕙性成,终以不废时文为主,则人材亦终无振作时也。世道陵夷,惟夫子独存巨眼,想此中利弊,早已借箸默筹矣。痼疾徧行,摄生不易,想道躬安耳,老血自持,且废医不废药之说,自今可以大行也。八月閒想必来湖上一游,是时天地寥戾,病气将究,可以执策从行矣。手肅,即请道安!

受業制章炳麟上,七夕

按,太炎迭遭父、姊之丧后,母朱太夫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故去,此札与第二通具名上皆有“制”字,作于太炎为母服丧期间。又第二通作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中旬以后,夏秋之间,此札叙事、辞气与之不相连贯,当非作于该年。

札云“长素欲设文庙于四夷”,殆指康有为倡言孔教事。《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下云:“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轹赐,狂悖滋甚。”^②是年初,康有为在桂林成立圣学会,次年六月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听天下人人会。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记:“丙申,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③是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章、梁订交之前,太炎似尚不确知康氏宗旨,则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本年三月,太炎致谭献书亦云“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④。

太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离开精舍,十二月已在《时务报》馆任职,与康党

①《沈家本日记》,《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3页。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5页。

③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21页。

④《章太炎书信集》,第3页。

不合,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十五日辞去。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三月:“十四日,晴,章枚叔过谈。枚叔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十五日,阴,晡,送章枚叔行。”^①是太炎十五日由沪返杭,以孙宝瑄由沪赴杭日程计,十七日可抵杭,其时曲园应在湖上,未知是否谒见。四月十六日,孙宝瑄在杭州过访太炎:“访章枚叔于横河桥北,板屋数椽,亦雅洁。枚叔读书其中,殊静。”^②此后据本年宋恕与太炎、童学琦、胡道南往还书札可知,太炎在杭任《经世报》撰述,拟《兴浙会叙》《兴浙会章程》,六月二十六日在余杭,数日后返回杭州。此札作于七夕日,云“来湖上一游,执策从行”,是太炎正在杭州,时间地点皆相合。其后七月十四日、十六日在上海曾访宋恕,此次赴沪或与任《实学报》撰述有关。又于九月九日之前返回杭州,《忘山庐日记》十月十日记“访章枚叔于《译书公报》”^③,则此时又已任职上海《译书公会报》矣。是年秋,曲园来杭,十月十一日以后返苏(说见第九通),未知太炎离杭前,曲园已到西湖否,执策从行否。又九、十月间康有为游西湖,或曾谒见曲园(说见第九通),而太炎明年上书曲园,有近闻康氏在浙云云(第八通),未及亲见,似康有为游杭时,太炎已赴上海矣。

《自定年谱》云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始去诂经精舍,由此札可知,二十三年丁酉太炎返杭之时,亦尝出入精舍。宋恕二十四年戊戌五月二十五日上曲园书犹云:“枚叔来自师门,杖履康强,洵慰私祝。”^④按曲园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在湖上^⑤,往年例于四月八日前返苏^⑥,太炎四月二日犹在上海(见《忘山庐日记》),该年疑或未及谒曲园。至冬日,曲园亦辞讲席焉。故《谢本师》有云“出入八年”。

康有为公车上书言变科举以前,《申报》已有“宜改时文为策论”之论议,其后论说纷纷。曲园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致翁同龢书:“中国自有制度,但能持以实心,则亦足以为国。即如以时文取士,明季已极言其弊,亭林先生至比之探筹,然本朝循用之二百余年,文治武功,儒林词苑,超逾唐宋。可知人材盛衰,初不由此。”^⑦二十四年戊戌致瞿鸿禨书:“八股与策论,同是以文取士,亦无甚轩輊。”^⑧《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二《心斋丁公家传》论曰:“夫时文诚敝,然圣贤精义,亦或藉此以存一线。若废去之,而别谋所以取士,用诗赋乎?空言而已矣。用策论

①《忘山庐日记》,第89-90页。

②《忘山庐日记》,第98页。

③《忘山庐日记》,第143页。

④《宋恕集》,第588页。

⑤《春在堂全集》第5册,第234页。

⑥光绪二十年甲午《湖楼山馆杂诗》自注:“四月八日先大夫忌日也,余每岁是日皆还苏寓致祭。”(《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09页)

⑦《俞樾函札辑证》,第442页。

⑧《俞樾函札辑证》,第292页。

乎？陳言而已矣。若竟改用西學，則人所童而習之者，惟是機械之巧。”^①

第八通

夫子大人函丈：

乾綱絕紐，崩風振埃，東見倉海，鐵椎未獲，奔竄以來，儻更燿火，世衰道喪，頽焉在懷。每念我師，清風素氣，下振湛濁，獨綸不移，縣此鈞石，雖恆輟東往，而夢在禮堂。孟秋西返，稍覲同志，果知杖履清慊，耆年復丁，積慕既抒，悲淚橫集。方今陰井扇燿，江湖異流，甘露之難，恃有從諫；陽平之輔，卒爲安昌。疊起倫囹，禍終聽勒，河決不離，嗟何及矣。麟去冬渡臺，匪遑黔突，藉彼袞鉞，訂我貞回，雖疚疾在躬，亦庶幾習鑿齒焉。大義既宣，投袂東逝，與二三耆儒，復理故業。東方夙學，率師範盜人，理證或優，訓詁殊紕。（安井衡每詆高郵王氏爲穿鑿，緣不通小學也。）惟岡本保孝，獨取段注解字，爲作正義，（所據《眾經音義》等書，多較懋堂所見爲完備，自謂段氏忠臣，良非虛語。）信其連蹤，惜下世卅年矣。麟宗旨所在，以荀代孟，震旦儒人，尠合茲契。惟日本照井全都著湯武、禮樂諸論，獨揭堯荀學，尊以繼孔，玄照神契，獨符鄙懷，捐館既久，不獲商榷大誼。（所著尚有《四書》《莊子》等注，安井衡嘗語之曰，“君真毛鄭後一人”，而世鮮知其名者。）晚有弟子曰太田代恆德，今亦逾六十云，根本通明，獨精《易》說，宗仰定宇，亮爲奧博，著《讀易私記》，義證粲然，惟劇謀革命，云非臣道，斯東瀛一隅之見也。二公皆華顛槁項，誓不斷髮，載其玄德，足以立慊矣。文士惟重野安繹，名位特達，宗禰方、姚，不越其則。又有河田熙者，曾許搜求服注《左氏》一通以贈，（日本延喜立學左氏，兼用服杜二家，此優于唐人之墨守《正義》者，其書若在，真鴻寶矣。）橐中既盡，遂難奄埃，失此和璧，沒世不樂。誠使六藝陵遲，王道泯滅，藐我微塵，何救焚阨，正使茲風不墜，則尚將重趼東厲，沒泗求鼎也。副島種臣，（嘗充中國公使，後以功封伯。）嘗語麟曰：僕爲外務卿時，以《春秋》之義，料量邦交，所在有效。斯則水精制濃，見諸行事者矣。又近世形名倦談，幽明輟講，學人夸毗，自畫占畢，惟茲名理，獨在裨瀛，既濟其肴核，傳之九流，中則仲虺、聃周之論，西則華嚴、成實之義，昔疑空言，今皆實驗。彼禪宗之遁辭，朱陸之箋語，方諸畫彪，形相將窮，比之塗羹，滄咀不飽，揮噴洞微，誠在彼不在此乎？浙中叢談名理者如燕生，蓋其冠冕也，惜夫枯此形骸，矜情修短，未極嵇生好鍛之樂，乃懷單豹遇虎之憂。夫大鈞槃物，奄速有期，崇仰三世，則縹面非悲；飡服六籍，則殺身何謝。而燕生結冰炭于彭殤，量鎚錘于菌蟪，以此繫念，尠不狂醒。臺山、默深，斯其昭鑒。然觀其吐言動辭，無阿權要，譬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嘗戲語之曰：吾輩之業，在《楊胡朱梅云傳》，僕自分爲梅子真，而君宜效楊王孫乎？若朱游則有志未逮也。怪

^①《春在堂全書》第4冊，第508頁。

此龍德，或躍在淵，久畔牢愁，喪其感槩，然後知歎逝為伐性之斧，小園實挫志之媒，異夫古之侏張獨行者也。儒俠日彫，士無固志，惟茲碩果，幸存孑遺，然已憂其隕落，悲夫。階青、少侯兩兄，近在都下，惟榮問休暘為念。濼濤飛沫，江水折揚，藉茲培風，敬附尺札。即請道安！主臣無任。

受業章炳麟上

按，太炎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月避居台灣，二十五年己亥五月由台灣渡海赴日本，七月由日本返國。札云去冬渡台，孟秋西返，則此札作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仲秋以後。

“東見滄海”之“海”，“陽平之輔”之“平”，原皆泐滅，茲以意補之。其他加框之字，小有殘泐。西漢王鳳襲封陽平侯，張禹為安昌侯，殆以漢成帝喻德宗也。太炎《答學究》云：“今禍患之端，始於宮鄰，卒於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①

太炎宗旨所在，以荀代孟。曲園則謂居今之世，只須《孟子》七篇便是救時良藥，硜硜焉抱遺經而究終始，又謂半部《孟子》足以治天下云^②。

安井衡，曲園同治六年丁卯（1867）春致戴望書云：“日本士人，惟得安井仲平衡所著《管子纂詁》，紙張刷印極佳；以書而論，似不及物君（茂卿）之《論語徵》。然仆實未嘗細讀，但記其《訂戒篇》‘里官’為‘釐官’之誤，頗足備一说也。又多引古本，未知與今本同異，亦未嘗細校也。”^③又光緒二年丙子（1876）致竹添光鴻書云：“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④

照井全都，宋恕《讀照井螳齋論語解》云：“光緒己亥，恕始聞之于餘杭章枚叔，稱為秦漢後一人。”^⑤即本年之事。又云：“曾以說《詩》惊安井息軒，稱為毛鄭之後一人。”^⑥太炎有《題封建禮樂等四論之後》《照井氏遺書序》。有云：“弟子太田代恒德為《荀子論》，亦卓犖絕流俗，華處而覈食，完發以居，人亦無止其門者。”^⑦

重野安絳（1827-1910），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初四日，太炎在台灣致汪康年書：“管森（鴻）者，事重野安絳。安絳官宮內侍讀，與黎純齋（庶昌）最善。故文亦專學桐城。”^⑧

宋恕（1862-1910）字燕生，曲園嘗贊其有“排山倒海之才，絕後空前之

①《章太炎書信集》，第39頁。《台灣日日新報》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十一日載。

②《俞樾函札輯證》，第689頁、第593頁。

③《俞樾函札輯證》，第40頁。

④《俞樾函札輯證》，第688頁。

⑤《宋恕集》，第303頁。

⑥《宋恕集》，第303頁。

⑦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補編》，第597頁。

⑧《章太炎書信集》，第8頁。

识”^①。是年八月十九日，宋恕致梁启超书云：“丁酉以后，频年卧病。自（戊戌）八月六日闻变至今岁，终日悲愤，贱躯益弱。”^②与人书恒露“身世艰危，生意枯涸”之意，复畏于时局，恐遭大祸，是以太炎叹其“殒殒”。十一月廿八日《与孙仲恺书》曰：“丁（日昌）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与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③又《己亥日记摘要》十二月初二日：“晤萧敬甫、徐次舟（赓陞）。是日，闻枚叔谈及强甫，重诬渠并及我之事，为之惊惧。而枚叔与次舟力争经谊，大犯忌讳，于是怕渠甚，而不敢多与往来矣。”^④此或太炎排满之始，宋恕畏祸而渐与之疏离矣。

太炎本年正月初七日致汪康年书：“燕生曾有信来，益自言潜心禅学，然与台山、尺木议论颇近，恐堕人天小乘也。”^⑤罗有高字台山，江西瑞金人，狂醒事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三》。

太炎光绪二十二年新正上书谭献：“身为经生，常慕朱云、梅福之风。”^⑥

王念曾，字少侯，一作嘯侯，江苏宝应人，曲园长女俞锦孙长子，父王康侯。娶曲园次女俞绣孙之次女许之颖^⑦，父许祐身，字子原。俞陞云续娶许祐身六女许之仙，中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探花，遂留都下。本年腊八俞平伯出生，曲园志喜自注云：“余生时，先大夫在京师，故有诗云‘春风吹喜气，千里到幽燕’，今陞云亦在京师，已发电报告知。”^⑧

太炎往岁上书曲园，曰“曩所敕厉，铭心弗忘”（光绪二十四年，见第九通），明年致书宋恕云：“曲园先生适作《秋怀》四首索和，其子同亡，《辍笔》《断葦》《传家》《祈死》。前日痛骂，今复相忘于江湖，乃如命和之。”（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⑨痛骂未知何时，盖自此以后，书问渐疏矣。

①《俞樾函札辑证》，第341页。

②《宋恕集》，第603-604页。

③《宋恕集》，第695页。

④《宋恕集》，第945页。

⑤《章太炎书信集》，第8页。

⑥《章太炎书信集》，第2页。

⑦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2015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第1592号拍品《刘屏山先生全集》二十卷，目录钤有“王念曾许之颖夫妇阅”藏书印，卷七钤有“宝应王念曾之章”印。

⑧《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35页。

⑨《章太炎书信集》，第16页。

第九通

夫子大人函丈：

久違杖履，孺慕殊深，近惟美意延年，箸簪行遠，繫我神州萌庶，寔頌祝之，寧獨禮堂親炙者哉。惟彼昆侖，狼子野心，非有北海之節，中散之傲，而自擬孔顏，非薄湯武，陽儒陰景，所至風從。麟于今春，已有箴膏發墨之作，遂與其徒挺刃相見。近聞昆侖在浙，復以其喬宇嵬瑣之說，與我師相詰難，數日不決，輒爾釀嘲，聞之益爲眚裂。大氏倖隱行怪，必有所託。彼既剽竊董何，假藉錐閨，即以董何錐閨之本旨破之，自當敗績失據。惟其徒黨熾盛，驟難扞禦，吾黨士大夫，根柢有餘，魄力不足，然比而輯之，亦非甚難。晉楸在吳，度我師必與有成議，是公兼通中西，力能馭騁。麟素欲與通札牘，自恨無因，佗日得藉師言，引爲同蘖，或于吾道，稍有裨益。夢香遠在三衢，未易糾合，其餘箸籍門下者，尚復不少。外此如孫君仲容輩，皆合志同軌，可成義旅。苟有願與斯事者，則犁庭掃閭，坐以待之。麟自秋季竄身海涘，與二三同志校譯西書，宗旨所在，靡取知彼知己，于祆神異說，一無所錄。同志皆毗陵人，能言小學，時吐論議，尚無鑿枘。爰居避風，聊復棲止。曩所敕厲，銘心弗忘，鞠脰書此，敬請道安！

弟子章炳麟厥角稽首上，十二月十二

按，此札既云“自秋季竄身海涘”，則當作于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太炎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抵台北。

兩日前，宋恕亦有函札呈曲園：“枚叔孤怀高論，與世不諧，負累千金，無計償補。近應東人之聘，筆削台北官報，聞府主意氣頗投，與謀開大書藏以辟人荒。”^①可見當時境遇。官報即《台灣日日新報》。

“昆侖”指康有为，太炎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致夏曾佑書云“梁公欲密召昆侖”亦然^②，故曰“密召”。

太炎光緒二十二年起任職《時務報》館，僅數月，與康黨不合，“攘臂大哄”，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辭去，三月十九日上書譚獻曾詳述其事，并云：“《新學偽經考》，前已有駁議數十條，近杜門謝客，將次第續成之。”^③六月上旬與同門宋恕書曰：“麟，鄙人也，于經術、文章未有一得。昨見手札，過蒙藻飾，許以俞門第一流，惴惴自惧，力小任重，久將覆餗。顧既與康黨相左，亦有騎虎難下之勢，非得君之規海，異時一有蹉跌，一身不足惜，亦為浙學貽羞。君縱不愛二君，于麟應少加怜愍；縱不愛麟，當亦為浙學大局起見。今日適得仲容來書，于廓清康學不遺餘力，度君亦有同志。頃二君既竭惓款，懸榻以待，麟則尤每飯不忘。

①《宋恕集》，第596頁。

②朱維铮、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頁。

③《章太炎書信集》，第3頁。

昔粤寇时江浙遗老日夜望曾文正一来，麟之重君，盖亦如是。”^①此札与之颇相似，殆有“新仇旧恨”之痛。吴承仕跋所谓“纠合义旅，犁庭扫闾，一何壮也”。

曲园儿孙凋零，晚年常叹老运屯遭，门庭凋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尤莹壮年殁谢，遂作哀词云：“嗟我而老衰，久混人间世。轻轻抱经术，将为世所弃。惟望二三子，起而张我帜。今又弱一个，吾道殆将废。”^②冀望弟子张大师门旗帜也。

而太炎避居台湾时，与康氏时有书札往还，并非如此札所述水火不容。作此札前一日《台湾日日新报》载其《答学究》，对康氏犹表同情；是月初一日太炎曾作《康氏复书》附识：“或曰，子与工部，往者平议经术，不异（范）升、（陈）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持正如工部，余何暇与论师法之异同乎？”^③明年八月更撰《翼教丛编书后》曰：“是书驳康有为经说，未尝不中窾要，而必牵涉政变以为言，则自成其疵病而已。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④

前录太炎民国十八年复吴承仕函云：“长素于甲午前已谒曲园，出其《新学伪经考》相示。当时鄙人尚未见其书，甲午后乃得见之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下亦谓“祖诒尝过杭州，以书示俞先生”。按朱一新曾上书曲园云：“一新在粤，倏历五稔。颇有康君长孺，以其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属呈左右，敬求教益。”署“上元日”^⑤。朱氏光绪十三年丁亥八月应两广总督张之洞函聘至广东，此札当作于十八年壬辰正月十五日。《新学伪经考》十七年辛卯七月刻成，康氏与朱氏夏冬间多次论难，并属朱氏寄呈曲园一部。曲园十八年壬辰二月初十日离苏往沪，尚未收悉，其初见《新学伪经考》在十六日，为沈能虎（子梅）在上海所赠，见《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并有评议。二十日至杭州，二十三日日记：“附来朱蓉生书，并以康君祖诒所著《新学伪经考》见赠，则余已见之矣。”^⑥三月初五日函覆朱氏。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不满曲园中立调停之论，致书千餘言自陈^⑦，望曲园正明是非，辅而翼之，末附居址为“广东城惠爱七约云衢书屋”。此为俞、康通问之始，书由朱一新转呈，实未尝谒见也。此后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氏仅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九月曾游西湖，十月还上海。

①《章太炎书信集》，第16页。

②《春在堂全书》第5册，第223页。

③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第589页。

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96页。

⑤《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下册，第334页。

⑥《春在堂全书》第7册，第776页。

⑦《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下册，第334页。

《春在堂诗编》二十三年丁酉八月后有诗题云：“徐季和学使自高氏山庄步至右台仙馆见访，是日乃其六十生日也，清谈小饮，赋诗赠之。”^①徐致祥会试硃卷生辰为十月十一日，与此相合，则曲园九、十月间亦在西湖。康氏谒见曲园，并有诘难，此札所谓“近闻”者，或即此时。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二十九日宋恕上曲园书云：“康工部尚留京，承询谨闻。”^②

林颐山，字晋霞，浙江慈溪人，肄业诂经精舍。事迹见杨敏曾《林晋霞先生传》，载 1937 年《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二期。冯一梅，字梦香，浙江慈溪人，肄业诂经精舍，曲园常以之与黄以周并举。博览群籍，太炎在诂经精舍时常往质疑^③，并为《春秋左传读》题签。

兹将以上九通考订时间，约为下表：

俞平伯编次	表述时间	考订时间、地点（阿数阳历，汉数农历）	丧服	新序
第一通		1893 年三月或 1892 年，杭州		1
第二通	六月中旬后，夏秋间	1896 年，杭州	制	5
第三通	十一月十五日	1893 年	期	3
第四通	七月二十六日	1893 年，杭州	大功	2
第五通	初九日	1894 年三月或四月，杭州	期	4
第六通	二月二十七日	1898 年，上海		7
第七通	七月七日	1897 年，杭州	制	6
第八通	孟秋西返	1899 年仲秋后，台湾		9
第九通	十二月十二日	光绪二十四年		8

太炎早年求学、交游、著作等情况，以及与曲园老人暨诂经精舍之关系，并学术、思想之变化，藉此九通书札，稍作梳理，初见梗概。惟冀博雅君子，匡其不逮云尔。

【作者简介】俞国林，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编辑，研究方向：文献学、清初文学、近现代学术史。朱兆虎，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编辑，研究方向：文献学、语言文字学。

①《春在堂全书》第 5 册，第 228 页。

②《宋恕集》，第 592 页。

③《章太炎书信集》，第 800 页。